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 年 9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言一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香港）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驥（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杨小刚（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

翻译：陈丹丹（英国）、吴万伟（武汉）

编者按：

关于过节，选择过什么节和怎样过节乃是重点所在。理论上，公民享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但事实上，摩登天空音乐节原定属于海外乐队的演出场次“毫无缘由”地悉数取消---许多乐迷也由此失去了前往过节的动力同欲望。据查，“节”原本意指告一段落，故而可以庆祝成果，可以展望未来。然此时此景，扪心自问：我们的生活是否真的变好，我们是否对未来有所期待？至少，相当数量的乐迷再不期待 Oasis，再不期待大量海外乐队参演的音乐节。

何以解忧？许是杜康，许是阅读。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影 像：言 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孙骁骥：来自洛克比上空的余音

书单

成 庆 贾 葭

戴新伟 孙骁骥

严 飞 刁 莹

书评

贾 葭：河山何日得珠还

朱 白：小津的淡然和淡然的《小津》

凌 越：兰波，一艘漂浮在冥界的醉舟

罗四鸽：一点常识

戴新伟：读陈志勇两则

孙传钊：法兰克福学派的诺依曼

访谈

阮义忠：眼由心生

讣告

欧文·克里斯托尔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金融,在一般人看来,本是十足的工具理性,但在陈志武的逻辑之下,却指向了国家的发展,个人的自由。金融在陈志武的世界里,俨然成了一个极具价值理性的伟大事物。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对陈志武的热爱才不断弥漫,以至于蔚然成风。我是如此喜欢他的金融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甚至像一首优美的现代诗歌,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金融得以自由发展,仿佛一个个具体的人从此挣脱羁绊,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行走。或者可以这样说,每个人都渴望自由,而现代金融则是我们寻找自由的方法。

对于传统的中国文人而言,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8月),我以为是一种空谷足音。多少年以来,我们抱守一种君子固穷的人生原则,抵制各种现代经济手段,尤其是抵制现代金融工具,以为那些纷繁的股票,债券、保险才是我们浮躁的原因,而事实上,当我们的金融不自由,我们的学问随之也不自由,从生存到思考,我们都成了国家的附庸。

很多既有的思维定势正在糟蹋我们,但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比如丰富的外汇储备让人们以为这才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但在历史的框架里,甚至在现实的实证中,这却是一个误会。事实是,那些负债的政府,他们的人民更容易得自由,他们的国家发展更有力,反之,那些腰缠万贯,国库充盈的政府,却纷纷昙花一现,不足挂齿。这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市场命题,政府太强,市场必然就要被消解,遍观整个人类经济史,找不到一个国家是靠政府的推动实现强盛的案例。

在陈志武的世界里,现代金融正是促使政府放权给市场的有效手段。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陈志武的金融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国家能力思考的层面,他的终极目的,乃是人的自由发展。这正是陈志武了不起的地方。中国读书人,免不了固守家事国事天下事的逻辑,而对人的行为却熟视无睹。我曾经分析过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学术框架,认为他一辈子的学术努力,基本上还是在国家发展的路径上努力,他试图找到中国积弱的深层原因,提出了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发展方法,但在人的建设上,却用力甚少。为他赢得大名的《万历十五年》,虽然是以人为单元组成的结构,但最终的指向,仍然是国家的生存,人在这样的历史分析框架里,仍然只是国家试图强大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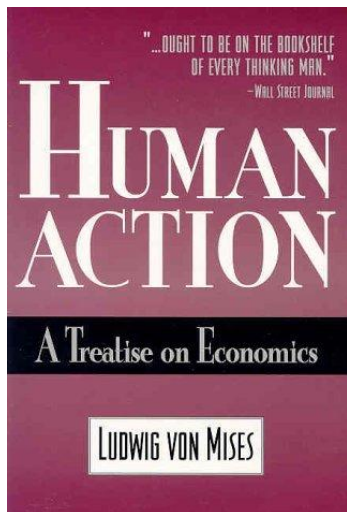
沿着这样的路径来阅读陈志武,我想说的是,他可能不是那种热衷于关注国家的宏大叙事,热衷于学术救国的学者,他的金融最终指向的,应该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我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我想起另外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可以这样说,在小凯 5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上,只有两个时期他在关注个人,第一个时期,他写出了《牛鬼蛇神录》这本了不起的著作,一些悲伤的个人命运被他记录下来;第二个时期则是他晚年信仰基督,基督救赎的终极意义,是对生命的拯救,神的国度不在地上,这种伟大的原则,直接消解了小凯一直以来奉为圭臬的国家主义思考。

很有意思,我提到的黄仁宇,杨小凯和陈志武,都是湖南人。近代以降的湖南人热衷于宏大叙事,已然是一种文化态势。从曾国藩、黄兴、宋教仁到毛泽东、刘少奇,均是绝对的国家主义思维。我们看到,作为学者的湖南人,似乎也不能幸免。所以我要说,湖南出了陈志武这样的教授,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是一种地理文化可能的新方向。

我们所有的努力,究竟是为了国家的强盛,还是为了每个人的发展,这是个问题。或者我们这样提问,国家是我们发展的目的,还是个人才是我们发展的目的,这种看似陈旧的问题,事实上已经辖制我们几千年。在这个古老的国家,人总是国家的附庸。在几个狭小的历史时段里,即便国家偶然发展了,那种宏大的国家能力迅速转变成成为奴役个人的现实力量。我想起布罗茨基关于现代专制的思考,在那篇著名的《少于一》的文章里,他说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家对人的奴役基



本上是一种原始的方式，但当现代化来临，当卫星、导弹、航空母舰成为一个国家的标志，人的幸福并没有因此增长，专制反而以一种更加现代化、也更加有力量的方式在继续进行。人的自由在这个时候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这样的描述让人难过。身处一个财大气粗的国度，政府不仅控制了经济，而且控制了我们的嘴巴，甚至连女生头发的长短，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如果布罗茨基不幸说出了真理，这让我们这些期待个人自由权利的人们，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多年以前胡适就说过的，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人才是这个世界的最高主题，人的行为才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最美丽的风景。最近一段时间，我把主要经历都放在阅读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夏道平译，台湾远流出版社）之上。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极为难读，又意义深远的书，米塞斯以人类行为学的一般理论为经济学的基础，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必须根据人类行为学来讨论。作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传人，米塞斯的思想沿着 5 个方面发展，(1)个人主观主义的行为学方法论，(2)货币价值的边际效用解释，(3)商业周期理论，(4)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5)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学架构，而人的行为在经济学世界里成为唯一的基础。作为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我想说的是，经济学和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其他学科一样，最终的指向是人。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持守，才是经济学的最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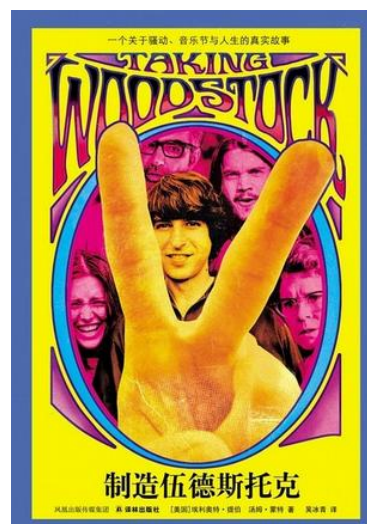
我们很容易误以为经济学必然是一堆枯燥的模型，或者是一串干瘪的数据，但事实是，经济学与人有关，而且只与人有关。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固执、封闭、向来以扼杀个人价值为己任的地方，竟然在有限度地介入市场经济体系之后，迅速为个体带来了一部分自由权利。而市场正是因为这些个体权利的回归，才得以形成浅层次的复苏。

ESSAY&STORY 散文·小说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

眼下是一个不再需要任何浪漫的时代，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在看《建国大业》时想到的。一切都是极具成功模样的努力，行为和内心，都是这里一场又一场伟大胜利的脚步。所以，以眼下之中国的现状再来看《荒野生存》（罗贝托·波拉尼奥著，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版）这样的小说，真的不合时宜，她不能给你带来任何效益，她没有任何功用，连闲情的“闲”都算不上，只能说是废品。这样一部近 50 万字的“废品之书”为我们讲述的是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在一股并非激情，也好像不是什么激昂的情绪蛊惑下，深入索诺兰沙漠，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女诗人……寻觅者，还是失踪者，不切实际的年轻人在才华横溢语言生动的小说家笔下，就这样展开了既激动人心又荒诞的“在路上”之旅。作家波拉尼奥具有一代偶像的气质，作为一个业余拳击手的儿子，波拉尼奥最不缺少的就是激进思想和生动的语言，魔幻而浪漫的气质正是包括他在内的拉丁美洲作家留给世人的独特印象。

没有偶像，没有精神寄托，这是迈克尔·杰克逊死后很多人对现状的判断。作为大众文化意义上最生动和伟大的那个符号，杰克逊在离开之后我们似乎真的从此无依无靠了，不是流行音乐概念的消失，而是激情和浪漫情怀的一去不返。所以，除了怀念，别无其他。《制造伍德斯托克》（埃利奥特·提伯、汤姆·蒙特著，吴冰青译，译林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版）是对一个高举理想主义旗帜年代的最好回忆。尽管你也许会对作者那些同性恋纠缠出来的怨恨感到不解（美国上世纪六十年对同性恋的态度跟今天比起来可大不一样），尽管你也许会对曾经图腾一样的那次摇滚狂欢感到一丝被解构和嘲弄的感觉，尽管你也许会在时空之外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皈依之后更加空虚无助……可是，这还是一本可以让人回到那个风华正茂、单纯得开出鲜花的年代。我觉得《制造伍德斯托克》不仅仅是乐迷对那场音乐盛宴的向往，也可以是任何人对于一个独特年代发生的独特事件极具个人色彩的窥视，作者埃利奥特·提伯提供的正是个人视角



下一代年轻人的心路历程。

一个本来跟音乐没什么关系、一不小心成为一场写入史册的音乐节绝对见证人的埃利奥特·提伯，写了一本《制造伍德斯托克》，无论从史料角度还是趣味性来说都无比靠谱，这让我想到以前不知道谁说的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不要读那些音乐人写的故事。也就是说，很多音乐人（哪怕是喜欢音乐的人）大多以自我感受为首要，并不看重如何把生动传达出去，这也就为他们的读者缩小了范围。但是，事情总有例外，越意外越惊喜。《纽约客》杂志乐评人尼克·霍恩比的《失恋排行榜》（原名《high fidelity》，意为“高保真”，卢慈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年 6 月版）就是一本绝对意义上的好看小说。一个三十过半的男人，一事无成之外还有遭受被同居三年的女友抛弃的厄运，他就这样在自怨自艾中不断以“TOP5”来解释自己的处境和心情，历年来的女友一一在回忆中呈现，一个喜爱音乐的青年的生命也随时渐渐呈现清晰。这里面有大概的怀旧音乐，或许可以让有些人会心一笑。作家霍恩比也创造了一种有趣的形式，想像一下，你的生命一遇到转折就要用“TOP5”来形容，跟多年前那个“荒岛物品”一样——这是一个多么文艺的抒情方式啊。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正是一个音乐怀旧的季节，连同刚刚可以看到的《海盗电台》（英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摇滚乐）、《线人》（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浪潮音乐）等几部电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好像正是一幅集体怀旧的景象。



尼克·霍恩比是一个在欧美流行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作家，他的作品以大众流行文化为背景、以宣扬青年潮流为己任，开放式的写作让每一个流行潮流之中的年轻人都会时而感到心有灵犀。他不但给欧美重要杂志写乐评，出版的小说和回忆录也颇为畅销，也被多次拍成电影，这些流行和畅销都跟他谙熟青年文化有关，或者说，尼克·霍恩比正是青年文化的缔造者和拥护者之一。国内出版社对尼克·霍恩比的引进也乐此不疲，从某种意义上说尼克·霍恩比身上的一切元素正是畅销小说和流行文化的最好注解。两部最新被引进的《砰！》（曾志杰译，万卷出版公司 2009 年 8 月版）和《极度狂热》（沙迎风译，万卷出版公司 2009 年 9 月版），前者类似一部好莱坞青春片，一点点颓废，些许叛逆，主要是幽默和聪明的段子，一个意外事件引发的青春故事，不过这是写给那些有过些经历的成年人看的，作者用心之处正是那种“回头望去白茫茫一片”的终极情结；后者是作者的根据自己的足球迷经历写成的回忆录，这又是英国青年的一段必然经过的成长之路，正如每一个英格兰小男孩人生第一次抉择就是要选择自己支持哪一支英超球队一样，“爱上足球，就像爱上女人一样”，是男孩成长中的一段必然经历。加上之前出版的《男孩，男人》（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自杀俱乐部》（张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版）和《如何是好》（尹晓东、何晓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 7 月版）等小说，可以说霍恩比真的是那种擅长捕捉流行元素和掌控现代生活节奏的作家，如果这位作家能够在国内流行起来应该是一件好事，至少会告诉人们一件事，畅销书到底应该拥有怎样一种品质。如果再与国内那些所谓的畅销小说作对比，你就更会发现，真正的畅销书首先是需要诚意的，一种对作者自己来说“伤筋动骨”的写作才有可能打动读者，而不是那些跟风似的简单模仿一些概念如职场小说、历史小说，如此简单就可以畅销的。

不仅仅是畅销书，任何与人交流的东西都需要的是诚意，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方式的忽悠。说起有诚意的创造，我想到近期刚读了的日本作家远藤周作，上次阅读报告里也提到过他的《深河》，那是一本经得起任何人阅读的小说。我想，对于读者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来说，诚意是最先打通两者之间障碍的一种武器。刚刚出版的《沉默》（林永福译，南海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版）是远藤周作的早期成名作，比较他晚年的《深河》来说显得刻意了一点，对于宗教的描述更多是集中在先入为主式的描摹和体会，而不是深入其中地展现。个人觉得从阅读效果来说，显然《深河》更具备打动人心的品质。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石家庄，zhm7976@126.com）

去年深秋，我在北京见到止庵先生，谈到他即将与王世家先生合编完成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1版），其时已经进行了七次的校订，而待我在书店里见到这套著作时，大约又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据说此书历经五年辛苦才终于编选完成，工作量堪称浩大，也幸亏编选的对象是鲁迅先生。在我购买了这套总共二十卷多达六百六十万字的全集之前，除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之外，我拥有数十种鲁迅的各类文集，而之所以还购买这套文集，我以为与最负盛名的人民文学版相比较，有如下几个特点让我动心：其一是版式装帧，人民版为软皮精装，人文版为硬皮精装，后者虽然豪华，但实在不适宜阅读，只适合摆在书架上当作炫耀的资本，特别是后者的内文字大行稀，为我所厌恶，简直就是为老干部准备的；其二为编选内容，人民版是迄今收集最全的鲁迅文集，包括鲁迅的著作和翻译作品，而人文版却只有鲁迅的著述，仅可以称呼为“鲁迅创作全集”而已；其三是编排方式，人文版本是按照鲁迅生前的自编文集的方法，而人民版则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编排，从日记、书信、创作、翻译，甚至是广告、启事、书帐等等文字，全部按照作家创作的时间顺序编选，这样的纵读对于重新认识鲁迅意义甚大。



除此之外，这套鲁迅全集还有两个需要强调的独特之处，一是收集鲁迅著述的内容至今为最丰富的版本，这主要体现在对于鲁迅译文作品的收录，将译文与鲁迅的著作同等对待，由此呈现出一个面目完整而并非割裂的鲁迅，其实按照纵读的方法，也不难发现鲁迅本人对于译文的重视，无论在时间跨度和数量上都超过了他的创作，而他对于自己的翻译作品的辩护与争论都体现出翻译在其生命中的位置；编选这样的全集，止庵那日会见时告知，其灵感来自于他在日本访书时的发现，在日本出版业中，许多著名的作家都享有出版“大全集”的待遇，这种全集收集作家生前所有相关的文字著述和图像作品，几乎统统收集整理，堪称是作家的纸上博物馆，而国内最有可能编选这样一套“大全集”的首选人物就是鲁迅，止庵称这次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就是一次初步的尝试；其次是止庵与王世家先生编选的这套鲁迅全集，不做注释，对此我起初颇有些纳闷，因为国内的鲁迅版本大多都有注释，且惟恐不够详细，但止

庵谈起我的这点疑惑，解释注释版本乃是大众普及性的，后来想想也是，这或许是当年鲁迅与伟人选集享受同等待遇的遗留产物。而那些已有的注释惟恐怕读者智力底下，无法按其意图读懂这些几十年前的白话文字，也真算是吾国当代一绝。

读这样的一套鲁迅全集，很容易感受到鲁迅生命的密度，特别是他从四十四岁开始到去世的五十五岁，每年一册或者每年两厚册；看他每天的日记、书信、翻译、创作，感受他对朋友、书商和学生等人的态度，跟随他看电影、收版画，去书店购书、商讨编选报刊，以及体验他逃亡、病痛的感受，而这很多种不同的生命形式往往可能会集中在某一天，有时一篇剑拔弩张的文章很可能是他在与许广平一起看完一部自己满意的电影归来，这是集中阅读鲁迅自编文集所感受不到的差异。鲁迅因此距离我们更加的亲切和自然，他的思想也是那样充满了张弛的节奏感，且拥有着一一种饱满的生命密度。其次是鲁迅生命的速度，通过这套全集，不难发现，鲁迅的生命所呈现的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从他早年断续的一些零星的创作和翻译作品，到晚年不断大量写作的著译文字，这从编年文选的厚度就可以看出来，越到晚年就越是厚重，一年两厚册七八十万字的作品量，这样的速度一直持续到他临终前而没有间断，鲁迅的生命因此看来，似乎像高空向下的飞翔，又似乎是长跑最后的冲刺。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拿一册鲁迅先生的编年文集，一页一页的翻阅着，感觉自己也满带着先生的清风，内心里也似乎渐渐地多了些许的清澈与辽远。

我私下里有一个判断文人读书境界与情趣的方法，那就是看他对于鲁迅的态度与熟悉程度。在近来所读散文作家耿立的新书《遮蔽与记忆》（文汇出版社，2009年7月1版）中，我发现在此著折页上的作者照片中，作家书房的书架上便有一套《鲁迅全集》特别醒目。由此，想来这样的一册著作应该不俗，待我读过几篇后，果然如我猜测，整本著作中弥漫

着一种让人精神激荡的气息，仿佛冒着思想燃烧的热气。《遮蔽与记忆》是一册与抗日战争有关的散文集，而作家更似乎想从历史的遗迹之中寻找被遮蔽的民族精神，鞭笞那些让人厌恶的民族败类，例如作家对于民族英雄杨靖宇、赵一曼、张自忠、蒋百里、赵登禹等等抗日名将的重新叙述，这些人物在作家的笔下充满着慷慨悲壮的英雄气息；而与之相反的是作家所书写的关于他所认为的民族败类，如对于汪精卫、胡兰成、周作人、梁鸿志、石友三等人的批判文字，极尽嬉笑怒骂之笔锋，均是很有感染力。通读全书，这册散文集给我感受最为深刻的是作家在阅读历史后的激愤之情，大有“历史不忍细读”之感，其对于英雄的高歌，对于的丑类的鞭挞，对于侵略者的仇恨，均是从细微的局部，集中写那些被历史遮蔽或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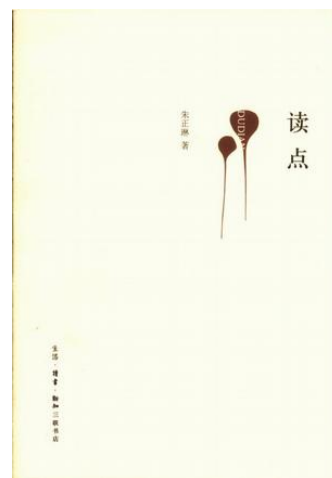


忆模糊的细节，并给予高度集中地呈现，比如在《无望的正义》一文的结尾写到一位叫侯二毛的十二岁姑娘，被日本人抓走后数日凌辱折磨，终被其亲人赎回，但却意外怀上了日本军人的孩子，由此引起了整个村人的愤怒，侯二毛在被迫吃下乡村大夫的中药后，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挣扎了两个星期后，死在了被她捅塌的土炕上，而村子里的人又找到一位铁匠，用三个七寸长的大铁钉，一边一根一根地将铁钉钉进侯二毛的身体，一边诅咒着说：“不能让小鬼子的孽种出来祸害中国人。”

这真是一种让人触目惊心的偏激与荒诞！在作家耿立的笔下，其激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特征，表现在对于人类种种令人不堪的凌辱与折磨的刺激感官的细致描述，犹如剥皮见骨，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在这册书中，一方面是日本人的残酷与暴虐，诸如对于赵一曼，作家收录了日本军医的一份医学死亡报告，读后几乎有让人翻浆倒海的痛苦，那些百般的折磨与凌辱已经达到了人间所能想象的极限；再如对于杨靖宇，作家写到英雄死后，被日本人割掉头颅，然后剖尸，最后丢弃荒野，这些残酷甚至变态的折磨被作家写得极为细致，读后大有句句震撼的效果；而另一方面则又是我们这个民族内部的败类们极为卑劣、猥琐与低贱的灵魂与丑恶嘴脸，且不说作家特意写到的民族汉奸汪精卫、胡兰成等人，在《带血的头颅》中作家写到杨靖宇之死，其实并非历史上所记载的自杀身亡，而是最终因为汉奸的出卖，其头颅被割掉也是这些败类们亲手所为，让杨靖宇死前所不能瞑目的竟是这样让人痛彻心肺的话：“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与耿立的散文集《遮蔽与记忆》所不同的是，作家张承志的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月版）则是对日本的一次十分郑重的告别之作。与前者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激愤所不同的是，张承志在这册书中所要表达的态度似乎有些令人感到矛盾，其既有对日本侵略战争造成我们民族灾难的愤怒，又有对于日本侵华历史成因的独到分析，更有对于造成日本人大量伤亡的核武器力量的抗议，也有对日本和平人士争取自由和平的敬重。张承志称这是他十多年留给自己散文写作的最后一个题材，如今愿望已经完成，其内在张力在于他试图在自己对于日本深入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纵横两个纬度来体会中日百年来的关系，在纵的方面，他通过历史的角度来写作，诸如在《长崎笔记》中他以长崎这样一个日本城市为中心，写它百年来所遭遇到的各种灾难与战争；而在横的角度，作家则把视角放在了全球化的角度，寻找日本与中国之外的第三者因素，试图告诫我们历史的灾难背后的某种真相。我虽然不完全同意张承志的某些论点，诸如对于美国的态度就缺乏他对日本的公允，但他从纵横两个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探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这种深入的思考令人敬重。作为一本散文集来说，我喜欢张承志文字中的一种雕刻感，这种文字的优美犹如利刃雕刻的纹路，简洁、有力、棱角分明，读后似乎感觉有一种字字入心的疼痛。

在职业与谋生之外的阅读生活，才是一种真正自由与享受的精神生活，用朱正琳先生的话来形容便是“读书是私事”。朱正琳的《读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8月1版）似乎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读一点书，二是读到点子上；前者是修饰的量词，后者是重点强调的名词；前者重在读，后者重在点；前者表达了一种谦虚的心态，后者表达了一种专业的情怀，各不相同的角度，却都表达了这册书所要表达的内涵。《读点》分为两个部分，上卷是“开卷篇”，下卷是“掩卷篇”，上卷是作者关于读雷蒙·阿隆、哈耶克、巴别尔、马内阿、钱理群、子尤等人著述的书评文字，大都不长，但言之有物，所表达的核心更多的是一种对于人类共有精神价值的认同与思考，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掰开‘买点’找‘读点’”；而下卷则重点阐述



自己三十多年来与读书之间的往事，读毕方才知道他的这些书评文字的精神底色，也很能典型地代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路径。朱正琳早年在文革中，他因为与同伴窃书而读，遭遇了四年的冤狱，后来写成回忆录《里面的故事》详细叙述其间难忘的人生磨难；八十年代风气渐开，他入北大读书求学，精神生活因长期的荒芜而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阅读“饥饿感”；九十年代，他从大学稳定的教授职位上辞职，北上操办文化刊物，然后辗转到中央电视台筹创和策划《读书时间》电视栏目，最后却看到这个曾经闻名一时的节目在挣扎中倒掉，其间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专制时代到精神娱乐化年代里，从争取读书的权利到传播读书精神的心路历程，而他所最想表达和争取地也无非是一种最凡常的人间权利：“阅读是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能满足精神的饥渴，正常情况下还应该能提供一种精神享受。”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临近国庆，为了响应“菜刀入库、马放南山”的号召，我基本上一直闷在家中重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在书的前言中，托克维尔写下了这样一段饶有意味的话，值得在此录下：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往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的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毫无疑问，这段话所描述的状况今日看来，也是对当下处境最为精到的总结。对财富的渴望、盲目的“爱国”情感、对道德的漠视，这种种精神无序化的症候，根源就是托克维尔所谓的“专制制度”，只是他无法目睹20世纪以来的政治制度变迁，他所针对的是18世纪的路易十六王朝，但今日与路易王朝却存在着相似性，那就是权力的集中和社会特权阶层的封闭性。当权力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不是以建设社会作为目标，反而是要依靠资源的分配去分化、压抑社会的成长时，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一个的“经济动物”，他们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赚钱和娱乐上，今天娱乐文化的繁荣，无疑是权力所乐见的结果，因为这可以消耗大众关注政治的精力，让他们只为一己的生活前途去打拼。同时，一个新的社会特权阶层已经悄然形成，没有背景的年轻人难以上升到社会的上层，特权阶层已经将大部分资源垄断起来，那些拥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初入社会，便会遭受重创，除非积极迎合这个封闭性的体制，否则他们将无法在这个社会的上升管道占据一席之地。

按照托克维尔的分析，当一个民族的发财欲望被充分激起时，同时政府又通过种种垄断机制压制民众的发财之路，这只会从两方面加速自己的毁灭。当然，托克维尔的分析只能是事后分析，无法作任何历史的预测，不过稍具历史意识的人应该很容易感觉到今日的危机感，这种感觉不是书斋里的呓语，也并不是历史过程的沙盘推演，而是我们亲身的日常体验，它是如此的切实，以至于常常让我会有“今昔是何年”的错觉。

之所以重读托克维尔，本是为了写作谢尔登·沃林的《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辛亨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月）的书评。沃林是美国响当当的左派政治理论家，不过他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政治。他的主要看法是，近代政治秩序是由经济秩序来主导的，也就是逐利的逻辑压倒了追求公共利益的逻辑，使得权力的分配、社会的组织化都是以经济原则来安排，由此，政治的活力也就逐渐消退，民主的力量自然就被腐蚀，因

为人们会以利益原则来看待自身、社会和权力，他们失去政治参与的激情，失去了“为公共利益而战”的政治活力，这种“去政治性”的逻辑，让沃林深感忧虑，甚至认为今日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颠倒的极权主义”。

沃林的分析无疑独到精准，不过将这一判断直接移用到我们的语境，或许也会出现焦距失准的情况，当然这一问题或许需要进一步分析，留待以后再说。

另外一本旧书新出也值得在这里介绍，即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此书最初在1993年出版，今日看来，仍然是清末宪政史研究中比较详尽的著作。不过该书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上，今日看来略显粗略，比如立宪与革命道路的分歧上，大家或许还需用张朋园先生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一起阅读。

本想再寻觅一两本新书推荐，可惜最近阅读所及，都是陈书旧刊，无法与各位朋友分享新书心得。或许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读书的速度永远无法赶上出版的速度，所谓新书推荐，本身或许就是一个“荒谬”的理想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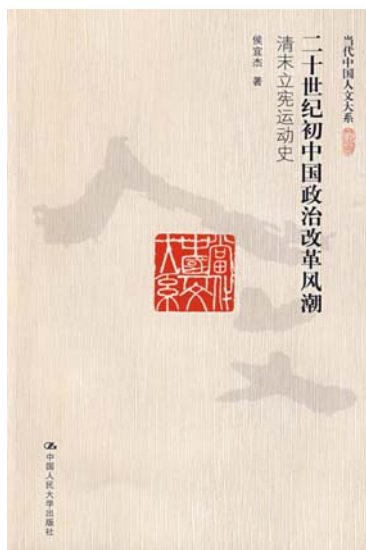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共和国花甲之年，喜报频传。新华社采访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这位“中国通”果然是中国通，盛赞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自由，同时盛赞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了思想的活跃，“随便走进中国一家大书店，在成排的书架上，既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最新出版图书的译本，也可以看到再版的中国经典图书，比如儒家、佛教、道教经典”。前《读书》主编、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同志，在法兰克福书展中表示，他主编《读书》杂志，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参见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这位所长的觉悟，让他的前前任李慎之先生相形见绌，先生有灵，一定感慨后生可畏。如今，一小撮别有用心作者经常埋怨审查制度，这种态度值得严重批评，审查制度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很多作者的觉悟还不够高，不适应这个历史上最自由的时代的需求，如果所有的同志都像黄平同志学习，审查制度就完全可以取消。

比如我，就经常躺在家中的床上，抱着一堆书，实践自由。9月虽然买书不少，但是读书不多，所以这里只能像阅兵一样，汇报一下阅书感受。

查尔斯·蒂利的《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是一本关于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简明读书。他讲到哈萨克斯坦总统于2005年12月以神奇的91%选票赢得第3个6年总统任期时，这样说：“每当我们看到总统候选人以超过75%的绝大多数赢得选举——特别是再次当选，我们就应该持有这样的假设：那个政权在进行虚假的选举。”前两天刚刚看过一部《给斯大林的礼物》，这是哈萨克斯坦70后导演鲁斯坦·艾德拉谢夫（Rustem Abdrashev）的作品，2008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据说预售票90秒脱销，打破了张东健主演的《海岸线》纪录。1949年，斯大林70寿辰，举国同庆，一小撮落后分子被送往集中营。一个犹太男孩侥幸逃脱，被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村庄接纳，天真的他没有因此对斯大林同志心怀怨恨，而是恳求苏联士兵给伟大领袖送去一只羔羊，希望自己的父母获释。当整个村庄举行文艺活动为伟大领袖送去诚挚祝福的时候，突然一股巨大的能量席卷而来，这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哈萨克斯坦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作为献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礼物。当然，导演比导弹温柔一点，电影中的犹太男孩此时已经离开村庄，得以逃生。从美学的角度看，这部电影有控诉之嫌，稍显直接，如同一个论坛的网友所说，属于“伤痕电影”。但是，在伤痕仿佛从未存在的情况下，“伤痕电影”的存在就具有重要的纠正作用。我好奇的是，这位70后导演如何看待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下，不是为了回避当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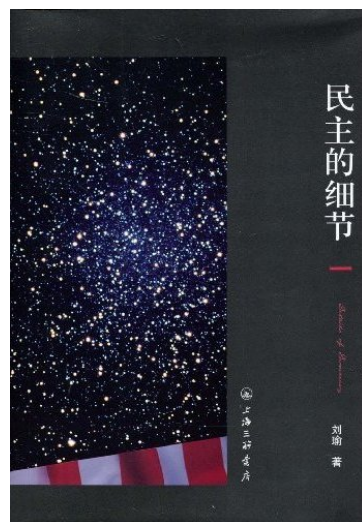
侯宜杰先生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频频出现在近十几年来中国宪政史研究的注释里，这次终于重印，并且补上了初版删去的征引书目。出

版社删除征引书目，理由常常是“篇幅所限”，我不明白的是，一本四、五百页的书为何容不下十几页的征引书目？显然原因并非“篇幅所限”，而是认为征引书目可有可无，更有甚者，认定学术注释有碍读者阅读，统统一删了之。另外一本获得重印的是王年一先生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6年、2005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但让我吃惊的是，第四版非但没有修订补充，反而为了免去重新审批，不再使用2005年的修订版，直接使用了1988年的第一版。我不太清楚，为何使用第一版可以不再审批，使用修订版就需要重新审批，何以厚今薄古？2005年距今未久，诸位如果可以找到这个版本，不妨喜旧厌新，虽然旧版本比新版要贵上1元5角，但是考虑到旧版比新版更新，这个差额想必是可以承担的。

夏天卧床，读了一系列清末民初宪政方面的著作，深感应该搁置宪政在中国是否可行的问题，直接进入宪政在中国如何可行的讨论。百年宪政，萌芽但未生长，人们在宪政是否可行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这种大是大非问题基本是鸡同鸭讲，到了最后成为立场之争，不可通约。对于认同宪政者来说，重要的是深入到宪政的细节，检讨其中得失。严泉先生在《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 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里详细讨论了制宪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虽然不像通常的历史著作笔端常带感情，以至于阅读快感稍打折扣，但是对“超议会制”等问题的分析，读来有拨云见日的感觉。刘瑜小姐打入美帝国主义内部多年，近年来又转战日不落帝国，《民主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6月）是她为祖国读者贡献的一份“敌情报告”。我没有买这本书，但是愿意强烈推荐，这并非不负责任，实在是因为其中几乎每篇文章，最初在《南方人物周刊》等处发表时，我都先睹为快。其中《大学向左，草根向右》等名篇，几乎熟读成诵，以至整理积压报刊，看到刘瑜的文章，就会左右为难，弃之不舍，保存的话又太占地方，但是最终依然弃之不舍。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还是要买本《民主的细节》，这样的话，整理积压报刊就比较省心了。

宋鸿兵同志就像《建国大业》的明星们，加入美国国籍，并且在入籍时郑重宣誓完全放弃对以前所属国家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但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孜孜不倦地从事“反美大业”，编著《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8月），报效祖国。与此同时，陈志武先生推出《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8月）和《24堂财富课》（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8月）。据说《金融的逻辑》密布机场书店，与《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平分秋色，对此我乐见其成。对待歪理邪说的最好方式，不是使用行政手段一禁了之，而是摆事实、讲道理。《24堂财富课》是陈志武课女心得，成年读者读来可能稍感浅显，但是从商业常识从娃娃抓起的角度来说，此类书籍多多益善。在推动普及商业常识上，吴晓波先生领衔的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用力甚勤，对于推动企业伦理起到不容忽略的作用。但或许出于推普考虑，这些书往往趣味有余，规范不足，比如俞雷先生的《追寻商业中国 第一卷·觉醒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09年3月），我读得兴趣盎然，但是整本书注释屈指可数，没有参考书目，让我时时怀疑自己读的是小说还是历史。俞雷在后记里提到自己读完了史景迁先生所有中文版的书籍，史景迁的叙事史学很受各方欢迎，但是他获得承认不仅因为叙事功力，主要还是因为叙事有着史学功底的支撑，几乎每本书都有着详尽的注释。考证确实枯燥，却是趣味的源泉。

说到趣味，推荐一本《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三联书店，2009年6月）。1949年，美国法学家富勒提出一个模拟案例：五名探险者困于山洞，弹尽粮绝，其中一人提议，大家抽签选出一人，以身饲友，这名提议者随后收回意见，但是其他四人请君入瓮，提议者正巧被抽中，四人获救后被送上法庭。富勒虚构了五位大法官不同的判决意见，美国法学家萨伯于1998年又虚构了九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几乎把20世纪各种法学流派的观点一网打尽。据说香港市府将《洞穴奇案》列为通识教育的读本，可谓书尽其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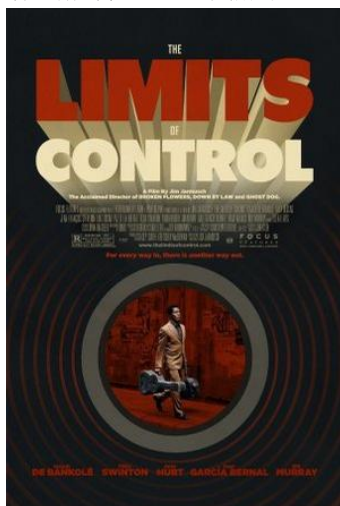
CINEMA 影像

观察员 言一 (香港, richard7briner@gmail.com)

网络时代的某个下午, King of Convenience 的新专辑就这样轻易地来到我的电脑硬盘。联想起最近读到的本雅明, 我开始怀疑这太过轻易的接近, 是否也将褪去 KoC 作品之上的 arua(灵光); 但初听之下却是那种久违的静谧---两个人依然就着舒缓的吉他随风吟唱, 仿佛几年来的时光不曾留下丝毫的痕迹(组员 Erlend Øye 曾以个人名义发表过不少电音作品, 近年来亦在俱乐部担任 Dj)。

于是, 我愿意去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可以不变的。不是无法改变, 而是不愿意改变或者被改变。可是, 对于另外一些东西而言, 如果他们只是潜藏或者未被遇见, 那么当某一刻来临, 改变自然不可避免。

抵港不过半月, 我却已经深深爱上在影院睇戏的感觉。除了大荧幕可以带来的画面冲击以及不俗音效之外, 我想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影院空间所要求的精神投入与不经意间的分享。换句话说: 不管对于电影或音乐而言, 现场都是重要而独具魅力的。它是一个让你集中精神面对一种艺术呈现的空间, 是一个默默分享的共同体, 也提供有可以从他人照见自己的镜像。在眼下这个机械复制艺术品的时代, 现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毒剂的作用。但由于电影和唱片本身的机械复制属性, 这样的解毒依然是不够彻底的。



从而, 我必须感谢香港电影市场的开放和广电总局的缺席。因为国内上映的电影, 实在让我提不起去影院的兴趣。而每每念及至此, 我一方面忍不住要歌颂国内盗版碟商为我等影迷所带来的福利; 另一方面却不禁在想: 这样的理由是否足以向母亲解释我藏碟的必要性, 母亲又是否会对无比实际地对我说: “广电总局是不会因此为你的藏碟买单的”呢?

贾木许(Jim Jarmusch)的新片在我看来, 至少是玩得有些过了。全片长近两个小时, 从一开始, 贾木许便大玩隐喻与神秘暗示的游戏。不少台词反复出现, 不少场景亦各自相仿。主人公的惜字如金, 极其自然地令到观众依着电影画面所呈现的种种行为暗自揣测。贾木许对于观众的操纵无疑是极为成功的。但人的集中力是有限的, 如果这样的操纵过于冗长, 那么观众就算愿意配合亦可能力不从心。而更为重要的是, 在历经了近一个半小时的揣测与被操纵之后, 一个依旧神秘淡然, 充满隐喻的结局是难以被大多数观众所接受的---他们会觉得此前的种种辛苦, 并没有得到 pay-off。即便持中立态度如我, 也难免会不无恶搞地去想: 在这部名为《The Limits of Control》的电影里, 所谓的 control 究竟是电影里所隐喻的种种, 还是贾木许其实在考验观众的 control 能力。

总而言之, 贾木许的新作是一部颇为形式主义的电影, 讨厌它的人会称之为 “为艺术而艺术”; 不过在我看来, 这部片子却可被视为一场 “意义漂流”的游戏。换言之, 这是一部需要被阐释的电影, 里面充斥了太多可以和值得去阐释的有趣元素。但显然,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的游戏, 亦不是所有喜欢这个游戏的人都会记得艾柯的提醒。

尽管杜可风的手持摄影所呈现的镜头几度让我产生眩晕之感, 但片中他对于西班牙这一国度之色彩的把握和表现依然是十分出色的: 鲜艳与冷冽的交叉, 产生出一种迷人的映射。然而真正带来惊喜的, 还是非电影原声莫属。几乎是从一开始, 那种我无比熟悉的后摇迷幻音符便开始在四周荡漾开来, 与杜可风的摇镜相得益彰。其后, 每每抵至关键暗示, 便总有音乐响起, 在马德里的 art centre 是 psychedelic rock, 在旅馆住处却是 Schubert 弦乐四重奏之慢板, 及至后来的小镇酒吧, 那手西班牙吉他, 那曲弗拉门戈民歌, 辉映之下, 已近天籁。

兴之所至, 索性连场再看郑保瑞加入银河之后的新作《意外》。郑并非学院派出身, 而此前作品如《狗咬狗》, 《军鸡》等给人的感觉皆可以用污秽与暴力来形容。此番加入银河, 其作品也自然倍受期待。但相信对于大多数看过《意外》的人来说, 如果不是事



先知道或者看到荧幕上的标注，估计极少有人会怀疑这不是出自杜琪峰的手笔。就拿饱受赞誉的开局五分钟来说，其紧张的节奏，高对比度的打光，人物走位以及镜头运动都带有十分明显的银河烙印。换句话说，从叶璇停车，到中建联的那位主席不幸被玻璃砸中，都是极其银河的风格；唯一能瞥见郑保瑞的地方则是在于其后借着古天乐确认死亡的双眼，对死者以及缓缓留出的鲜血进行的特写。

尽管除了开局，随后也还有不少可以瞥见郑保瑞影像风格的地方；但这样的地方终究太少，《意外》也就终究变得银河起来。只是对我而言，郑保瑞这部《意外》的风格究竟如何以及他随后的风格走向，并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真正 matter 的地方还是在于，作为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它究竟好不好看，它在试图传递和表达着什么。

影片的前半部分，无论是视觉呈现还是叙事节奏方面都是极为出色的---说到节奏的话，这可能与本片依旧由 Xavier Jammaux(《文雀》音乐主创)操刀配乐有关---作为影片主角的古天乐其内心亦随之渐渐被猜疑和恐惧所侵蚀。面对这越发庞大的猜疑与恐惧，影片后半部分必然要给予其出口，给予其化解，并且其化解的方式同样必须是一个“意外”。对于《意外》的后半部分，尽管郑保瑞，或者说司徒锦源的确给出了一个比较意外的化解，但这样的化解却没有足够的力度去承担此前积累起来的猜疑和恐惧，尤其是恐惧。换句话说，这样的结局对于我来说，依然不够意外。但像这样一部保持风格的优良制作，对于大多数银河迷而言，却是早已值回票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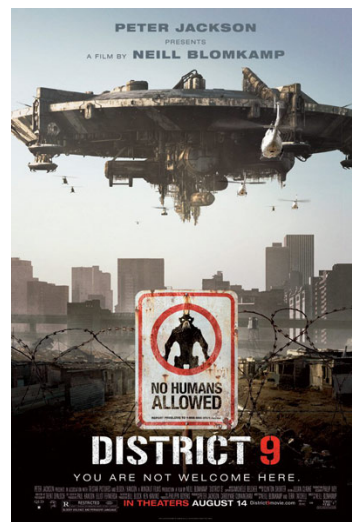
同样是银河，韦家辉此次自编自导的《再生号》亦再次令我叹服。在编剧方面，韦家辉可谓少年成名；而他与杜琪峰的合作则往往催生经典，从银河初期的《一个字头的诞生》，到银河十周年之《神探》，无一不足以写入香港电影之教科书。但此次与刘青云合作之《再生号》，若就电影整体而言，恐怕勉强触及及格线。可一旦剥离影像，仅就剧本而言，在香港却是无人能出其右了。

在《再生号》中，女儿希望能以写小说的方式唤回丧身车祸的父亲，以此来为母亲疗伤。但在女儿的小说中，却是一个相反的世界---女儿，儿子，母亲在车祸中丧身，父亲打算通过写小说来抚慰自己。两个叙事线条，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更多的叙事线条开始出现---因为在父亲的小说里，同样有出自女儿手笔的小说---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小说中的小说里的小说。而再加上阴阳空间的相互穿插，据有心人统计，在韦家辉的这部《再生号》里总共出现了 7 层叙事空间(我前面只提示到第三层)。可以想见，这样的叙事方式必然如同《神探》的结尾那般引发诸位影迷无休无止的解密以及观影过程中按下暂停键的冲动；但若抛开叙事中的精密构架，我所看到的却是韦家辉对自身的探询：作为编剧，他和“女儿”一样，可以在剧本(小说)中决定谁生谁死，要什么发生就有什么发生。可是在现实中呢？在现实中又是谁在决定生死，决定偶然，决定悲喜？面对现实，自己手上的笔究竟可以做什么，是自我疗伤，是警醒世人，又或者是其他什么？韦家辉自身的悲天悯人，亦在此显露无疑。

只是我依然忍不住要说：《再生号》的女一号选角实属败笔。来自大陆的阎清就算加上了罗敏庄的配音也依然显得格格不入，无法承托起其所需要表达的感情。我亦从小道听闻，此女一号曾一度打算邀张柏芝出演。印象中的柏芝性情不乏刚烈之处，饰演这样一个需要强烈情感表达的角色实属上上之选。最终未能出演，希望不是又一次出于进军大陆市场的考量。

小制作的科幻片历来颇受我青睐。由于资金有限，所以无法在华丽的场面营造和特技上下太多功夫，而只能通过其他的侧面来展示一些特别的东西。《第九区》便是这样一部电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其实是冲着 Peter Jackson 的名头去看《第九区》的，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收获了惊喜，然后留意到其实这样的惊喜是来自于一个名叫 Neill Blomkamp，尚不到 30 的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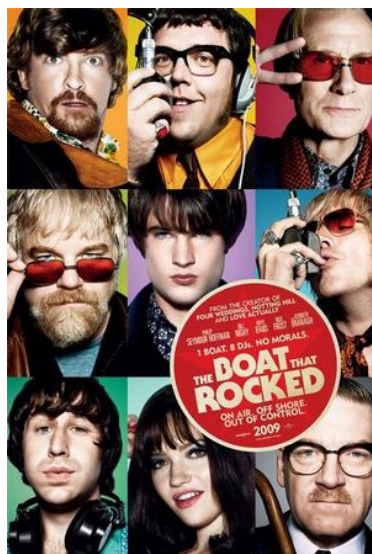
导演 Neill Blomkamp 的南非背景，以及将事件发生地选在约翰内斯堡，令不少人认为《第九区》在很大程度上影射了当下南非的种族歧视状况。但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却并非都是因为种族，还可以是因为社会阶层，宗教信仰……等等。归根结底，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认同。而任何一种基于此种不同所生发的出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自发隔离，人与人之间的自发隔离，其决绝程度都比种族歧视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世纪的麻风病人，当下的艾滋病人---这样的人或群体，在他们染病之前和我们很可能是无差别的。只是因为他们出现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不同，于是便被我们自发隔离。从而，仅从种族的角度来对《第九区》进行诠释，显得有些大而无当；真正的关键当是



在于：变异所导致的身份认同的改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九区》跳出了科幻电影长久以来正邪斗争的传统套路，而以身份认同的转变这一内核触动了更多观影者的心灵。同时，它也暗示了一些以“xx 权益保护组织”为名的 NGO 的华而不实，或者用昆德拉的词汇讲，叫“媚俗”。同样的逻辑在港片《性工作者日记》中则表达的更为直白：你又没有做过鸡，凭什么来教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片中的主人公倒是因为变异而得以体验在地球做外星人的感觉，但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恐怕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承受的。显然，有些路，“变异”之路，很可能是无法回头的。

有些路无法回头，有些年代亦只能缅怀。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借着伍德斯托克 40 周年缅怀那个属于花童，属于摇滚的年代，但《海盗电台》的出现却实实在在地又一次在我心里漾起那飘向上世纪 60 年代的怪异乡愁。这一乡愁之所以是怪异的，不仅仅是因为我完全不曾经历那个年代，还因为我是如此清晰地看到这乡愁背后所隐藏着的乌托邦。那种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艺术的乌托邦，音乐的乌托邦，摇滚的乌托邦。



正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我们所能控制的仅仅是第二反应而已。故而，面对这样的乌托邦，面对这样的乡愁，面对《海盗电台》所带来的重现，我依然忍不住深陷其中，肆意狂欢，把 F-Word 说上无数遍，一次次用右手比出那个爱的手势。

狂欢过后，留下的往往是悲凉。片中的“海盗”们曾在电台即将沉没时对听众说：就算电台沉没，我们遇难，但一定还会有人继续来为你们播放这些好音乐的；唯一遗憾的便是，播放这些音乐的人不再是我们了。”海盗”们的话放到现在早已变成了现实。在英国，摇滚早已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变成了主流文化的一种(似乎印证了福柯关于权力收编能力的论述)；而就传播摇滚的媒介而言，也从电台电视，发展到了黑胶，CD，以及当下的网络多媒体。但”海盗”们或许无法想象的却是：当年电台所拥有的荣光竟也随之褪去，因为当下的人们拥有了太多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渠道。换句话说，当下的人们既不需要遮遮掩掩地在半夜收听电台，也决不可能就着一台收音机翩然起舞。一切的一切，似乎在不经意间，便印证了本雅明的判断：当音乐变得如此切近易得，它的灵光(arua)亦随之褪去。而生活在这样一个机械(数码)复制时代的我们，亦不知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MUSIC 音乐

观察员 言一（香港，richard7briner@gmail.com）

范晓萱的《赤子》，在我看来可算是 8 月以来华语流行中的上佳作品。这样的判断，有着我私人的情感在其背后。当范晓萱还是“小魔女”之时，我对她的关注是被动的；换句话说，是由于其极高的媒体曝光率。直到《爵士名伶》的出现，我才恍惚意识到她的转变。而其后的《还有别的办法吗》令人惊艳。我讶异于她所做出的转变，从一个青春偶像，慢慢发掘出音乐上的自我。这样的转型，在娱乐圈是颇为难得的。大多数的歌手一旦被公司，被市场定型，就再也跳不出那个并非自己的自己。

然而，由于感情问题和媒体的负面报道。范晓萱在《还有别的办法吗》之后，几近崩溃，无心音乐，几年的时间只是写出了一本叫做《乱写》的日记，令人叹惋。

本以为她会就此消沉，寂寂无闻下去。不料，07 年她携乐队与 EP《突破》归来，虽然只得三首曲目，但其上升势态却已



昭昭然。

用不负众望一词来形容《赤子》或许并不恰当，因为我无法确认究竟有多少人在期待她的新作。但对我而言，《赤子》以其音乐上的优质，成就了属于范晓萱自己的一份新生宣言，是一种在经历了诸多坎坷与挫折之后的内心力量的喷发，尽管，从专辑中曲目的名字当中还可以看出不少怅惘，迷茫，不屑甚至些许愤怒，但能以歌曲的方式书写和表达出来已经是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接受---对过往不完美自己的接受。从而，这样的内心是值得信赖的，这样的人也是值得期待的。

同期发行的华语流行当中，苏打绿的《夏•狂热》总算是正常发挥，收回部分《春•日光》所造成的失地。但就专辑本身而言，依旧和其文案当中所许诺的音乐品质相去甚远。所幸，我本就对苏打绿的维瓦尔第计划毫无期待，一心只等看笑话---在我看来，不管是打算在一年内出四张原创专辑，还是打算在一季之内触及一个城市，一种文化的神髓都是极其愚蠢的。就像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会飞的不一定是天使，所以也不要以为加入了一点迷幻吉他就是英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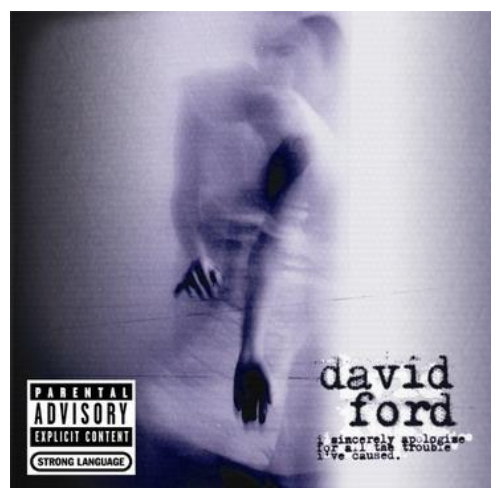
蔡健雅的《若你碰到他》耐听度很高，制作方面也颇为精良。怎奈依旧不改抄袭，平白丢去不少印象分。在眼下这个网络时代，抄袭在变得极为容易，被抓的几率也大大提高了。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宅男宅女在听着那些在你眼



中几乎不为人知的音乐。陶喆的新专辑《69》几乎是被骂了个狗血淋头，理由大致在于：应该好好写 R&B，而不该去玩什么摇滚。尽管专辑本身素质不佳，但这样的批判理由，实在只能被视为某种狭隘的体现。相比之下，R&B 新人王方大同的翻唱专辑则大受欢迎。对此，我除了对该专辑的选曲颇有微辞之外，也还觉得：方大同其实一直都面临中文吐词方式的先天不足，给填词作曲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尽管在以往的创作和演唱当中他已经努力弥补，但还是能很明显地听出由中文吐词方式所带来的滞涩，以及所丧失的 R&B 乐句间起伏轻柔流畅的特质。回想起来，或许真的只有当年陈淑桦的《淑桦盛开》实可算得上中文 R&B 的天衣无缝之作(诚如 redhousepainter 所言)。

陈奕迅的新作《上五楼的快活》，从 demo 开始我就没能听出半分的快活。也许是近日粤语歌听的多了，怎样都觉得港人所填写的国语词不够有味，一不小心就流于表面堆砌词汇。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对比的是麦浚龙的最新 EP《天生地梦》。不可否认，麦少的声线天资不足，唱歌方面需要多多用技巧来弥补。但这些年他在音乐制作方面的努力与进步却是有目共睹。在这张《天生地梦》当中，麦少请来林夕，周耀辉填词，配合其素有的暗黑气质，愣是使得这张《天生地梦》显得韵味悠长，颇有出尘脱俗之感；而对于那些熟悉林夕的人而言，当可在这张专辑中重温林夕笔下特有的婉约与怅惘。

陈奂仁这个名字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香港，他的名字其实是和张学友，尤其是陈奕迅，陈小春和陈冠希连在一起的。要么他曾为之写歌，要么曾担任其专辑制作。不过，现在他却突然从幕后跳将出来，奉上一张《Raw Jazz》，着实意外。恰如其名，这张《raw jazz》的缘起就足够 raw---陈奂仁在某次玩 jam 后反复回味其中滋味，终



于决定不顾一切自行打造一张爵士唱片。此外，陈奂仁自身的声音也很 raw。坦白说，他的声线并不是演绎爵士的最佳选择，但他在其中的自由发挥却颇得爵士神髓，收放自如，加上三位乐手的精彩伴奏，实在是别有一番韵味。至少，你听得有趣，他玩得开心。

似乎对华语流行乐坛而言，从来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所以像李玟这样当年的天后级歌手重新发片亦都显得无人问津，但就音乐本身而言，这张《Coco 的东西》其实颇为悦耳。同样久违的还有风靡一时的张宇。一张 EP，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招牌嗓音未变，只是更显沉稳。

不得不承认的是，除了范晓萱的《赤子》，许多华语流行专辑都没能在我的 playlist 待到足够长久。真正吸引我的依然是来自欧美的音乐，尤其是那些潜伏已久的大牌以及老牌，突然的发片，往往带来欣喜。比如 6 月发片的 Tortoise，比如 9 月归来的 Muse 跟 Zero 7；又如 6 月的 Moby，

7 月的 Mew, 9 月的 Jet。如果真要一一细数下去, 那么这个名单将变得很长很长, 而我也无力一一去点评。关于我极其钟爱的 Tortoise, 袁智聪先生已经有珠玉在前在此不必赘述, 而对于其他的那些美丽的作品, 我更倾向于仅仅说出音乐人的名字, 或是贴出唱片的封面。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眼睛和耳朵。最多不过, 我再继续坦白: 在我写稿的这个下午, 将我耳朵唤醒的是, 来自 David Ford 的《I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All The Trouble I've Caus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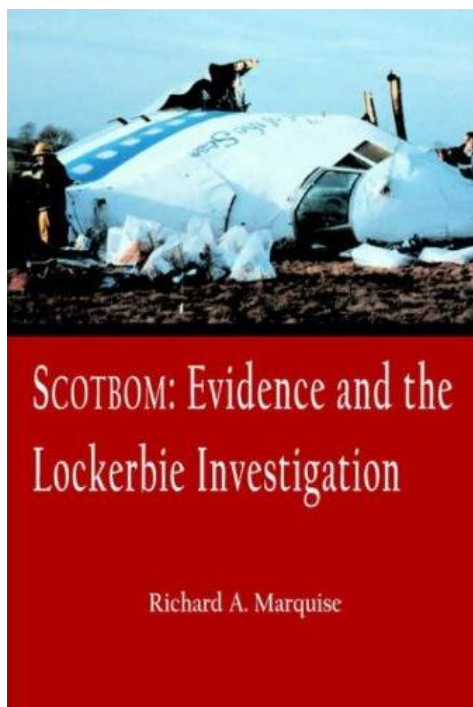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ENGLAND 英格兰

来自洛克比上空的余音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 (北京,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2009 年 8 月, “洛克比空难”制造者之一的利比亚特工迈格拉希, 被苏格兰当局以“人道理由”释放, 在离开故乡多年以后得以返回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事后, 苏格兰的司法大臣麦克艾斯吉向苏格兰议会解释说, 迈格拉希虽然对苏格兰毫无仁慈之心, 但苏格兰仍有责任对这个可怜的囚犯以德报怨, 表现出一定的怜悯。从表面上看, 司法大臣的论据似乎仁慈而理性。此前迈格拉希一直在格拉斯哥市格里诺克监狱服刑, 如今, 身患前列腺癌的他被医生确认只剩下 3 个月左右的生命。此时, 释放这位行将就木的人回到利比亚, 让他在故土“有尊严地死去”, 自然不失为文明国家为罪犯提供的基本“人道保障”。



不过, 尽管得到了苏格兰部分洛克比罹难者家属的支持, 但这个决定更多地受到了各种声音的指责, 这当中有英国的, 也有美国; 有来自民间的, 也有来自官方的。大家关注的焦点归结起来无非是: 对于迈格拉希这样一位恐怖分子说放就放, 这合法吗?

这个疑问, 在苏格兰议会回响了一月有余, 仍无定论。其间又传出了不少与之相关的消息。迈格拉希在回到利比亚以后, 受到了英雄般的接待, 并且他在接受采访时更是隐晦地表示自己实际上是无辜的, 主谋另有其人。同时, 英国政坛又有传言说, 释放迈格拉希, 其实是因为英方希望将此作为送给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礼物”, 换来两国的石油协议, 以填补北海油田枯竭为英国带来的能源空缺。当英国的司法大臣对着记者的话筒默认了这一传言时, 人们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这又是自己的政府搞出来的一次“法律问题, 政治解决; 政治问题, 经济解决”的愚弄公众的行为。

人们在对麦克艾斯吉前些天一直鼓吹的“人道主义”嗤之以鼻的同时, 对释放迈格拉希的合法性, 就更有疑问了。负责对此事进行调查的保守党议员比尔·艾特肯就在《卫报》上公开表示了自己对苏格兰政府的不信任, 声称要将此事彻查清楚。不过他也说“我们希望尽快通过调查弄清决定释放这位袭击者的过程是否合法, 但我们并不准备去判定这个决定本身的对错。”

而对于当年在审判迈格拉希时的诸多疑点和漏洞, 他现在更是绝口不提, 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释放迈格拉希是否“程序正义”的问题上, 仿佛“洛克比空难”这个事件本身早已盖棺论定, 无需再费唇舌。

这话听起来似有道理, 却经不起推敲。否则, 你拿那些版本众多的传言和煞有介事的小道消息怎么办? 敢于仗义执言的英国律师加雷思·皮尔斯 (Gareth Peirce) 在 9 月号的《伦敦书评》上发表长文说, 她经过仔细考察当年的档案资料, 发现“洛克比空难”疑点众多, 绝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此, 真正的要害问题并不是如今“放”迈格拉希的程序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而是当年“捉”他的过程或许本身就不合法。

既然说到当年，不妨回顾一下事情始末。1988年12月21日，英国苏格兰洛克比镇上空发生恐怖分子策划的泛美航空103客机爆炸案，机上259人无一生还，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公民。而在飞机坠地之后，小镇居民也有11人罹难。遭到飞来横祸的是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从此几乎成为空中灾难的代名词，而灾难本身则让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第一次亲身感觉到恐怖主义的“恐怖”。12月22日黎明时分，闻讯赶来的苏格兰警察把失事现场重重封锁起来，开始取证工作。尽管搜寻人员带着各种仪器对这一区域的每一寸土地进行地毯式搜查，寻找遇难者尸体和飞机的残余物件。但是高空爆炸后飞机的残余物洒落得十分零散，这为取证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很快，英国秘密情报局(MI6)、苏格兰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及联邦调查局(FBI)联合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经过近一周的努力，他们找到了大部分遇难者的尸体和近两万件大小各异的飞机碎片，这些碎片全部上交了英国国防部所属单位进行分析，以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正当专家和技术人员对这些飞机碎片进行分析、模拟和鉴定的时候。调查人员们注意到一片金属板上残留的少许痕迹，以及来自一部东芝录音机的碎片。经过鉴定，金属板是机体前部行李舱的碎片，而痕迹则是一种高性能塑胶炸弹的残余物。炸弹名为塞姆泰克斯，是军火界最负盛名的塑胶炸弹，也是最受恐怖分子青睐的一种产品，一般的安全检查仪器对它无能为力。炸药被放置在一个手提箱里，与录音机链接。而录音机，就是这枚炸弹的计时器。

以上这些内容，都不难从曾经参与“洛克比空难”调查的前FBI探员理查·马奎斯(Richard A. Marquise)所著的《证据与洛克比调查》(Scotbom: Evidence and the Lockerbie Investigation)一书中找到。书中，马探员盛赞了这次国际刑侦合作的成功，不过，他同时也将当年FBI与英国警方的合作共事形容为“非常密切，虽然并不能总保持一致”。

那么，当年可谓沆瀣一气的英美，双方分歧又在何处呢？马奎斯没有很清楚地告诉读者。倒是皮尔斯在《伦敦书评》的文章，提到了几处细节：最开始，搜救工作是在苏格兰警方和当地居民的协力之下进行的。纯朴的苏格兰小镇居民认为，既然飞机是在苏格兰境内掉到地上的，还伤及了苏格兰居民，那么此事苏格兰就算是管定了。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事自己是很难“管”起来的。没过多久，一些身着泛美航空员工服的人士来到现场调查取证。但这些无论搜集情报还是调查取证都极具专业素质的人，与其说是航空公司员工，不如说更像是国安局的情报人员。看到空中不断增多的飞机和调查人员，洛克比当地的居民感到事情正在逐渐起变化，因为他们发现，这些既不归英国约克郡警方管辖也不归苏格兰管辖的“入侵者”们，基本上把大到机身碎片，小到乘客衣衫纽扣的物件一股脑全都带走，而其他人可以说是毫无机会接触这些证物，更不要说参与调查了。实际上，苏格兰，此时已经被踢出局。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查取证，直到1991年11月14日，英美两国才宣布了洛克比空难的调查结果：空难是由两名利比亚情报人员制造的。一位是前利比亚航空公司驻马耳他办事处主任阿里·穆罕默德·迈格拉希，另一位是他的同事拉明·哈里发·弗希迈。他们将藏在一部东芝录音机的炸弹行李从马耳他送上了103航班。

然而，皮尔斯的怀疑在此时才真正开始。她提出了调查中几个耐人寻味之处，首先是怀疑对象的问题。“洛克比空难”的调查人员们，似乎对谁是坠机策划人的取证，有些因果倒置。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调查方取得了怎样的证据，

然后借此推论出谁是真正的嫌疑人，而是将整个逻辑颠倒过来，先怀疑，或者说先“内定”凶手是谁，再尽量拼凑出支撑自己观点的材料。马奎斯的话几乎代表了每一个调查人员的态度，“我知道还有什么人也牵连进来了。只是FBI和警方暂时没找出证据可以指认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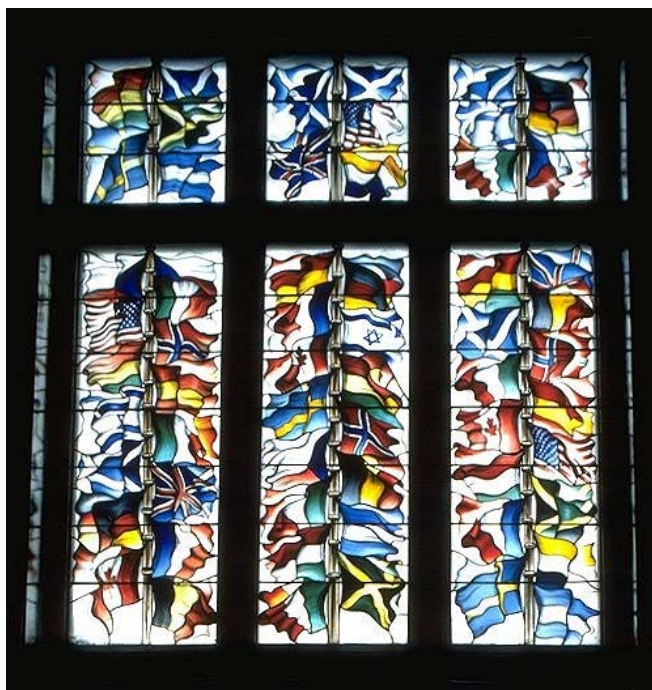


当然，对“谁是凶手”的设定绝不会是凭借调查人员的心血来潮来加以最后拍板，显而易见，背后的政治力量才是真正的“话事人”。其实自飞机坠毁以来，就有多个国家上了调查人员眼中的“黑名单”。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 General Command），以及伊朗、叙利亚等国都榜上有名。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这个由阿荷曼·基利尔（Ahmed Jibril）领导的组织，自70年代就不断策划各类飞机炸弹袭击，并且，在空难前两个月，他们曾经被查出在德国法兰克福地区使用过与泛美103号残骸中发现的“收音机炸弹”非常类似的设备，因而嫌疑重大。1989年末的《星期日泰晤士报》甚至刊出报道，以不容置辩的口气一口咬定此事乃人民阵线总指挥部所为。

但数月之后，风云突变。1990年4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此举至少危及到美国10%的原油供应以及西方国家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利益。原先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遏制伊朗的美国，此时开始考虑更换它的盟友。

于是，美国主动缓和了与伊朗的紧张关系，而之前被视为恐怖主义国家叙利亚则成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遏制伊拉克的主要军事盟友。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指挥部的总部，就在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因此，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名字也就从嫌疑名单中被除去了，置换它的，便是三番五次向美国叫板，在西方眼中“很不听话”的利比亚。

由此观之，美英两国历数利比亚的“罪恶”，其实是有一定的政治前提的。但是马奎斯仍然在他的书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感觉，他坚信恐怖组织的成员一旦被德国人拘捕便无法完成任务，而他们索性把袭击计划转让给了利比亚。而皮尔斯对这种先入为主的见解感到很荒谬。她认为在这种目的性过强的假设背后，其实是政治对于司法的操弄。因为在被国际社会勒令交出恐怖分子之后，利比亚越是大喊冤枉，美英就越有理由对其进行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



这种分歧不难解释。在政治策士们眼里，法律基本上只是政治的一个附属品，一种“抵达”某种利益的途径。但在法律专业人士看来，所谓司法独立于政治而独立存在，不受外界政治力干预，此乃不证自明、不容挑战的公理。皮尔斯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笃信市场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她自然不会例外。

根据她的分析，洛克比空难案的很多“证据”都存在漏洞。就拿探员海耶斯发现的录音机炸弹残骸为例。根据他当年的最初证词，残骸是在飞机的底层运货仓被发现的，而调查的结果又显示爆炸应该发生在货仓最上层，因为炸弹是从马尔他进入德国，当飞机中途在法兰克福降落时被作为货物装上飞机。很明显，这其中必然有人撒谎。此外，海耶斯将所提供证据上交后，直接负责的FBI探员托马斯·瑟曼并没有及时记录那块碎片的影像资料，后来根据海耶斯对证物的描述所作的记录，偏偏又在资料归档的时候遗失。

耐人寻味的是，直到在2000年出庭作证时，海耶斯却又改口，称自己是在货运仓第二层找到的录音炸弹残骸。而且在后来第三国境内临时的苏格兰法庭里，除了庭内的三位法官之外，并没有陪审团人员到场。海耶斯“对口供”的行为也就没有得到更多的质问，最后不了了之，迈格拉希最终被判有罪。这在与法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皮尔斯看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审讯期间苏格兰拥有该处地方的主权，在苏格兰法律下管治，那么依照海洋法系统的惯例，审判是必须要陪审团在场的。这种没有陪审团的审判，在她看来，不仅结果无效，而且本身就不合法。

“到底谁应该对空难负责？”皮尔斯认为应该重新调查此案，在符合法律精神的前提下找出真凶。但她几近天真的意见，又有谁会倾听呢？马奎斯已经以FBI探员的身份为这个事件定性了：恐怖袭击。而现在，“恐怖主义”这个词几乎保证了它不会受到法律屏障的制约。

多年前的《华盛顿邮报》有篇文章，称在空难调查的过程中，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就多次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秘密通话，告诫她考虑到美国在黎巴嫩的人质，千万不要触怒中东国家。当时热衷于和美国一道构筑“自由经济体”的英国当

然言听计从，而如今自作主张释放利比亚特工的英国，背后的动机是为了利用利比亚解决迫切的能源危机。其实说到底，二者都是一种“利益结盟”的政治算盘。这就是英国式外交的逻辑，一方面尽量不要得罪自己的盟友，但实际的利益，即便算尽机关也是一定要弄到手的。至于 20 多年前洛克比上空的那声爆炸，虽然至今仍留有余音，但其间已经夹杂了太多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利益争斗的杂音，它本来是什么，反而没有人清楚了。

Richard A. Marquise: Scotbom: Evidence and the Lockerbie Investigation, Algora Publishing, Sep 2006, £14.50

BOOKLIST 书单

成庆

在读:

[日]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2009 年 5 月版，19.8

元

印顺:《佛法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6 月版，9.5 元

待读:

[美]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4

月版，34 元



贾葭

已读: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2009 年 9 月版

在读:

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4 月版，32 元

戴新伟

已读:

英若诚、康开丽:《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张放译，中信 2009 年 9 月版，288 页，

32 元

沐斋:《温文尔雅》，上海古籍 2009 年 8 月版，206 页，28 元

陈履生编著:《黄永玉的万荷堂》，漓江 2008 年 5 月版，481 页，49.80 元

[法]勒内·夏尔:《勒内·夏尔诗选》，树才译，北岳文艺 2002 年 8 月版，159 页，12

元

在读:

[英]约翰·伯格:《讲故事的人》，翁海贞译，广西师大 2009 年 9 月版，388 页，29.80

元

[俄]曼杰什坦姆:《曼杰什坦姆诗全集》，汪剑钊译，东方出版社 2008 年 8 月版，412 页，50 元

待读:

[美]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集》，陈东飙/张枣译，华东师大 2009 年 3 月版，28 元

树才编译:《法国九人诗选》，上海人民 2009 年 6 月版，267 页，35 元。

[法]米歇尔·德吉:《听说》，余中先译，上海人民 2009 年 6 月版，237 页，32 元

[法]菲利普·雅各泰:《菲利普·雅各泰诗选：1946—1967》，姜丹丹译，上海人民 2009 年 6 月版，257 页，35 元



钟鸣：《涂鸦手记》，上海人民 2009 年 8 月版，389 页，49 元

[古罗马]卡图卢斯：《卡图卢斯<歌集>》（拉中对照译注本），李永毅译注，中国青年 2008 年 11 月版，26 元

王稼句：《听槽小集》，中华 2009 年 9 月版，222 页，24 元

止庵：《茶店说书》，中华 2009 年 9 月版，234 页，25 元

扫红：《尚书吧故事》，中华 2009 年 9 月版，243 页，25 元

孙晓骥

已读：

[美]弗里德曼：《媒体的真相》，梁岩/王星桥译，中信出版社，2007 年 5 月，19 元

[法]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范炜炜/戴巧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 年 7 月，30 元

刘瑜：《民主的细节：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 6 月，25 元

在读：

[英]克里斯·盖姆：《英国地方政府（第三版）》，张勇/胡建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3 月，45 元

[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模式：36 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陈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1 月，39 元

[英]Andrew Marr: 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Pan Macmillan Ltd, Mar 2009, £8.99

[英]Sarah Thornton: Seven Days in the Art World, Granta Books, Jan 2008, £15.99

严飞

在读：

王绍光：《超凡领袖的魅力，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版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版

蒋彝：《重返中国》，三联书店（香港），1980 年 6 月版

待读：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2009 年 9 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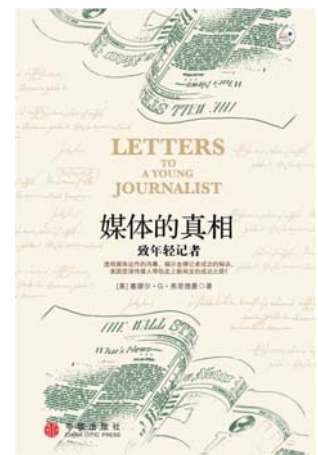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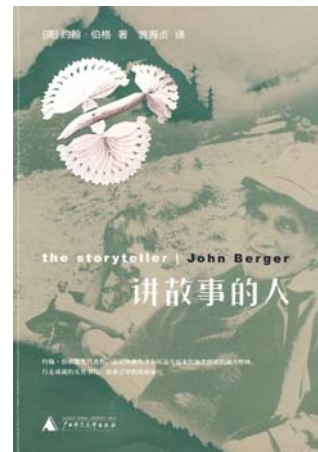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版

熊景明，关信基：《中外学者论 21 世纪初的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版

许宝强：《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义的危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9 年 7 月版

罗维明：《香港新想像》，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9 年 7 月版

梁文道：《访问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上书局，2009 年 7 月版



刁莹

在读:

[美] Russell Roberts :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美] Alan Greenspan : The Age of Turbulence, The Penguin Press,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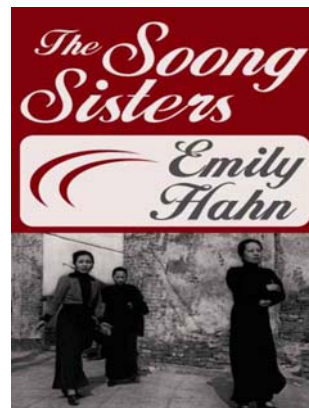
[美]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美] Emily Hahn: The Soong Sisters,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1941

[美] Raymond Carver: Cathedral, Collins, 1984

[美] Barack Obama : Dreams from My Father, Random House, 2004

[英] William Shakespeare: Othello, Penguin Books, 1968



BOOK REVIEW 书评

河山何日得珠还

特约撰稿人 贾葭 (北京, jiajia80@gmail.com)

国庆甫近, 秋寒渐起, 北京城一派喜气洋洋。逢九之年, 例该大庆。天安门城楼业已修葺一新。如今的城楼与周遭景况, 与六十年前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之时相比, 已颇为不同。广场外围的国家大剧院、公安部大楼, 都是近年才竣工的大型建筑。沉睡于广场中央的毛泽东不会想到, 其身后的中国会有如此巨变。

从高大敦实的苏式建筑过渡为玻璃钢结构的现代西式建筑, 可窥见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之一斑。而作为共和国肇创者之一的毛泽东, 颇为钟情中式传统建筑, 他居住过的中南海、钓鱼台、双清别墅、西湖刘庄, 都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早期让北京与莫斯科变得极为相似。

现代史上, 中式建筑最为集中之地, 当属南京。1928 年的《首都规划》确立之后, 国民政府的五院及各部会的办公大楼, 大部分为名匠精心设计的传统建筑。这一风格延续到国府播迁台湾之后。蒋中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心仪, 也由此可见。台湾今日之“行政院”大楼, 与南京国民政府旧址之行政院大楼, 几乎完全一致。

这种复制行为, 可远溯至朱棣北迁。今日北京故宫之体例, 即完全因袭南京故宫而来, 只是规模过之。蒋中正去台湾之后, 也曾经复制许多南京的建筑, 行政院不过其中之一。与朱棣相比, 其规模便远远不如。蒋故世之后, 国民党为其修筑的中正纪念堂, 与早年国民党在广州修筑的中山纪念堂, 也颇为相似。

此种建筑传承, 在国民党的政治仪式中极其重要, 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建筑作为“礼”之外化表现, 有其严格秩序。国民党虽据台岛偏安一隅, 然则“正统”不可偏废, 俗谚谓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因此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机构, 逐次建设, 只是规模略小。在中国历史上, 维系正统之努力, 多见于王朝末期。

北京的新政府, 为彰显其正统, 在建国之时, 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请至天安门上并奉之为中央政府副主席, 而且多次强调共产党与孙中山之密切联系。在最近的数十年之中, 每年五一和十一, 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面北而置于天安门广场之中, 与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相对而立。在中国礼仪中, 南面与北面, 其地位岂可以道里计。

这个代表着中国形象的巨大广场, 一直是外界观察中国的指针之一。当孙中山的画像第一次取代列宁和斯大林之时, 曾引起外国媒体的一致猜测。这算得上是六十年来, 最令人关注的变化之一。若将六十年置于历史长河之中, 不过为白驹



过隙之一瞬，对当下之中国人而言，则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份量。

沧海桑田的变幻，一姓之兴亡，宗庙之变迁，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家而言，原系平常之事。百姓的颠沛流离与苟且偷生，庙堂之上又有几人得睹。贾谊说的“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本就不是政治家愿意检讨之事。然则，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死生，公也。但真正重要的生民忧乐，却并不为人重视。在宏大叙事的书写惯性下，几句轻描淡写的“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就将政治的无情悄然掩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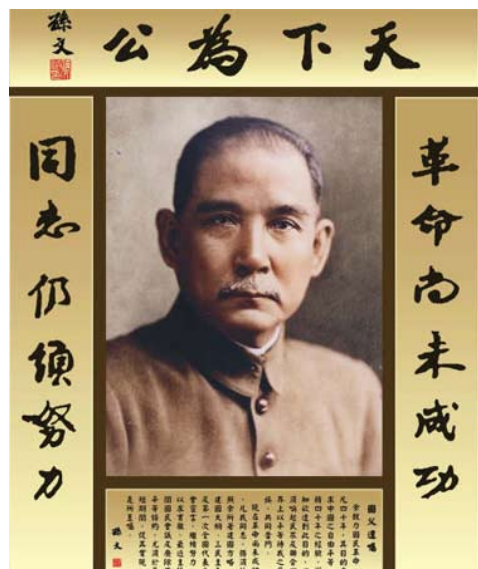
沧桑之叹，人皆有之，而小人物之运命浮沉，却不常见。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开篇文章，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在 1949 年 1 月自浙江淳安赴广州军中探夫，随后便随大军南撤，在海南岛登船赴台。多年回乡之后，当年千山竞秀的淳安古城，竟已变成沉睡水底的遗迹。

应美君 1949 年离开之时，古城里街市太平，安详得像以往的千年一样。短短十年之后，因为大跃进修水库，新安江在这里被断流，原来林立栉比的数不清的山，变成了岛。淳安城的千年的人文繁华，俱往矣。如今这里叫千岛湖，水下那个 1500 多年历史的江南小镇，只存在于应美君的记忆之中。

人们劝寻找父亲坟墓的应美君遥祭，这个要强的老太太冷冷地说，“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沧海桑田的变幻，在她这里，是如此的具體和残酷。应美君 50 年前离开时的那不经意的回头，居然就是对这个古城的最后一瞥。她在火车上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

那些当年被迫搬迁的淳安人，散落到安徽、江西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同样是 1959 年，有数万人因为修建人民大会堂而搬迁到北京丰台的乡下，从皇城根儿到荒郊野外的这条路上，没有人公开抱怨，一切为了国家。抛开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节点，不论是兵荒马乱还是承平年代，中国人总有不同的痛苦历程。

每一种痛苦来临之时，都有不同的恐怖和记忆。如今这种记忆，被深埋于历史的底稿深处。胜利者炫耀自己的武力与光辉，战败者不能面对历史的阴差阳错。在政治宣传明示或暗示下，人们刻意记住某些东西，又刻意忘记某些东西。最近数年，有许多人在做民间个人史口述，就是对这种记忆的一种挖掘。走不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永远也不会看到真相。



龙应台的这本书，选择从家族史到国族史的叙述逻辑，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试图展现国共内战的另外一种面目。作为战败者后代的龙应台，在这本书完成之后，在扉页上写道：向失败者致敬。等到书即将付印的前一刻，她冲进印刷厂，将这句话改成“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

这可以视作是她对国共之间成败的超越。也就是说，历史不在于褒贬成败，而在于展现事实，展现人性的悲欢与痛楚。尤其是一部国共内战史，究其本质上说都是就是一部血泪史。林怀民在看完书稿后给龙应台发短信说，“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对这部书的期待是，“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

应美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50 年 5 月，在国府撤退台湾半年之后，在舟山群岛上，不满 14 岁的少年姜思章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抓兵到台湾。1982 年他突破禁令，偷偷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随后回台发起“返乡运动”，与国民党的禁令做不屈斗争，最终促成了 1987 年的开放探亲。两岸一水相隔，鸡犬之声相闻，而不相往来四十年。

如何在国共内战结束 60 年之后，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新的价值，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不论是哪一方，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内战对整个民族的伤害。这不仅仅是“兄弟阋于墙”的事情。假如将当前的台湾问题视作“内战问题的延续”，那么从这一角度看六十周年，就会有新的意义。

台湾《中国时报》的王铭义兄，有次在饭局之上，向我展示了一本不多见的书，书名为《阎院长言论集》。内中有一份声明，是 1949 年 10 月 4 日阎锡山在广州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发布，题为“为共匪在北平成立伪政权告全国同胞书”，文末呼吁“加紧奋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全国人民的。”

而在此时，北京的新政府正在与“全国人民”欢庆自己的胜利。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全国人民”和自己站在一起。阎锡山率国府大员迟至 12 月 8 日才从成都飞赴台北，而离开大陆最晚的国府要员，正是蒋中正。

他12月10日才从成都登机。此时，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从10月1日到12月8日，中国在实际上有两个政府，各自强调自身的正统与合法。

即便是国民党败退之后，这种强调也是无日无之。至今，在台湾的各种官方正式场合，都要悬挂孙中山画像，台湾官方至今仍以民国纪年。一方面孙中山成为两岸共同的政治资源，一方面双方又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职是之故，两岸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法统问题”。单就此点而言，倒与六十年前极为相似。

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画像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里悬挂的孙中山画像，其蓝本是一个版本。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远超过引用列宁与斯大林。虽然当下的中国是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渊源，但就实际而言，今日之马列毛邓思想及理论，已经过共产党人的一再延展，融合了几代领导人的新思维，成为治国圭臬。

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则认为自己已经践行了孙中山的理念。台湾自1988年解严之后，历经数次宪政改革及领导人直选，已经完成了政权的民主化转型。但台湾地狭人寡，转型之艰难较之大陆，恐怕更容易一些。目前，孙中山作为两岸共同认可的“国父”，不应当只是偶像意义上的政治人物，或可从其思想资源中汲取可为两岸和平发展的资源。

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议墨尔，在《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一书中说：

“孙逸仙英年早逝，未及说明将以何种方式，何种方法来实现其理念。蒋介石因此肩负一个世上尚无任何国家领袖能胜任之任务：将人口最多，幅员广大，有数千年历史传统，对西方文化完全陌生，分崩离析，内有军阀割据，外遭列强瓜分，形同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

这当然是对蒋介石出于“理解之同情”。墨尔也认为大陆长期以来对蒋的评价，显失公允。六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承袭的历史任务——将此不堪之中国，变为一独立之现代化国家——被毛泽东和他的继任完成。同时，台湾也结束了独裁政权，建立起民主政体，被称为世界华人民主的典范。两岸各擅胜场，如何相互借鉴乃至融合，都是考验当下两岸政治智慧的课题。

一个甲子前的风云变幻，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极为丰富。重新发掘内战的深层蕴义，正是我们回望六十年的意义之所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经历了这六十年，不应该再从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去看待这一事件。只有超越这一窠臼，方能看到亿万生民的真正需要。龙应台就说，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应该对内战的亡魂有一个追悼的仪式。

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追悼。仪式做给亡魂，但活着的人在，看，“中国”不是两个字构成的，而是亿万民众的共同体。没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国也无从谈起。而个体的苦难与幸福，则系于国家之兴衰成败。李敖在天安门城楼上写下“荣辱与共”四字，不是没有深意的。这个国庆，不仅仅只是一场典礼和一个长假。除了现在，我们还需要未来。

于右任先生晚年写《怀念大陆》一诗中有四句，“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正是“哀生民之多艰”的写照。古今同心，古今同理。龙应台的书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谁也不能涂改和抹杀。1959年大饥荒，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以后是要写到书里的！”写到书里，就是支持我们最大的力量。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9月版

BOOK REVIEW 书评

小津的淡然和淡然的《小津》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

小津安二郎是那种可以放在世界电影史上永立不倒导演，我甚至有点过分地觉得他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整个东方电影了。如果非要评选出一位导演，来说明亚洲人在这种艺术形式上的造诣的话，我觉得小津安二郎应该是比黑泽明更靠谱的人选。原因就是在小津那里，你会发现所谓东方文明的气味，这种气味纯粹到可以迷人，不分国界和种族地迷住所有看过他哪怕一部作品的人。而在包括黑泽明、今村昌平、李安等人那里，不是说不存在这种气味，而是不够纯粹。

小津那种一以贯之的纯粹气味，使其在死后这么年来一直被人们缅怀，这种缅怀并不是那种对一个大人物的单纯性纪



念，而是那种伴随着岁月流逝、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电影总量下，小津的作品仍保持着非常迷人的可看性，一代又一代的影迷在故纸堆中发现小津，进而一次次地走进他所营造的那种氛围中，感受到他用画面所要传达出来的浓郁的某种味道——这是一种具有非常实用性的缅怀。我觉得肯定有许多人跟我一样，看到小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在那么多年前竟然有人这么拍电影。我觉得不必再多说小津的电影怎样怎样了，你只需看上一部他的作品，甚至看上几个片段，你就一定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无时无刻不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家的魅力。在世界范围这种缅怀也是时常发生，比如德国导演文德斯导演的《寻找小津》，侯孝贤的那部完全向小津致敬的《咖啡时光》，都可以看做他们曾经是如何地受到过小津这位逝去已经几十年的导演的影响。这是一个从导演自身散发出来的那种魅力，不可阻挡，甚至没办法争取或者泯灭。

关于小津安二郎的书，世面上已经足够多了，说实话我一直没有特意看过哪个，因为我觉得对于小津这位导演来说，你只看他的作品就足够了，而且对于我来说，小津的电影似乎看也看不完，总会时不时地就冒出几部“新的”。这样缺乏考证的态度，我不觉得是自己还不足够喜欢一个导演的表现，恰恰相反，小津是在我这里那种可以看上一辈子的导演，跟基耶斯洛夫斯基、库布里克一样，反正他们早早就已经挂掉了，留给我慢慢去读他们的时间还长着呢。可能自己这种平淡地去看小津电影的心态影响了我，我觉得唐纳德·里奇的这本专著《小津》，也是作者没有一惊一咋、平静而淡然地书写出来的。你看他的文字就知道了，这是一种与配得上小津电影的写作，或许正是作者刻意追求的，反正在解读作品这件事上，唐纳德·里奇的这部《小津》真的可以算是形神兼备。

举个例子，在谈到小津由于疏忽而导致的一个失误时，里奇这样分析道：“对于一个风格如此严谨，见解如此庄肃的导演而言，小津的这种疏忽令人难以置信。也许我们不应该将严谨等同于有条不紊、一丝不苟，但即便我们宽大到能够接受这个观念，我们也难以认同小津作品中的方圆桷凿之处。事实上小津对剧本心细如发，对剪辑要求严格，对演员也雷厉风行，但是到了实际进行拍摄的时候，往往会变得松懈下来。除了这种说法，我们找不到可以解释他持续出错的理由。”

我觉得在这样的计较和梳理中，作者里奇也展示了一种足够“小津”的方式和气味，仿佛也是在平静地将生活中一件常常会犯错的事情展示给你看。这种对小津作品的解读之所以能与被解读的作品形神合一，这肯定跟作者多年沉寂在小津的作品中有关。据介绍，唐纳德·里奇 1947 年从美国来到日本，开始对日本电影产生兴趣，然后与导演小津安二郎结识，并与其作品结下历经几十年的缘分。从他与小津交往的十几年，到他在小津作品中度过的二十几年，在小津死后的 1974 年他写出了这部《小津》，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无法说清楚的冥冥之中发生的某种暗示和巧合。就像小津在生命经历了整整六十年后死于与自己生日同月同日一样，是说不明白的某种的神秘。小津的人生、电影美学和拍摄技巧，用一种小津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我觉得读这样的书就跟看小津的电影一样，也是一种享受。

即便不扯到神秘，里奇的这书专著也可以让人看出他不但是小津的粉丝，也是小津的一个知己。从里奇对小津的了解和受到其影响的状况下，我也看出来日本从文学到电影的某种力量。比如那种对“淡然”的描写和“淡然”产生的力量，在刚出版的日本 80 后女作家青山七惠的作品中也出现过，那种关于生活里出现和消失的美，人物对之无奈之下也只能看其离去，哀伤一下还要继续生活，这种淡然，是日本文学和电影中常能见到的一种艺术审美。这在近几年的电影《东京塔》、《入殓师》中也有很好的展示。这种“淡然”让人想到了传承，对于这种美的传承在日本文艺作品中是明显存在的。而就此对比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就知道，好像我们的艺术家根本不需要什么传承，我们只需唾弃一样，什么传承啊、继承啊、影响啊，你根本找不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的文艺作品是如何全面处于低下、低级和劣质的境地。温习小津，不得不再次感到中日艺术家的差距上可真是随处都可以看见的啊。



[美] 唐纳德·里奇：《小津》，连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 4 月版，32.00 元

BOOKREVIEW 书评

兰波，一艘漂浮在冥界的醉舟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进入大海守夜，我接受风暴的洗礼，
在波浪上舞蹈，比浮标更轻；
据说这波浪上常漂来遇难者的尸体，
可一连十夜，我并不留恋灯塔稚嫩的眼睛。

这是兰波的名作《醉舟》中的诗句，整首诗处理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所钟爱的流浪的主题，但是在意象的繁复和新奇，语调的决绝，以及诗中“我”的无畏和勇猛方面，这首诗胜过以往一切同一主题的诗篇。

这首诗创作于1871年夏秋之交——那是兰波的诗歌季节，整整两年后，兰波创作出他最有名的作品《地狱一季》——兰波接受魏尔伦等诗人的召唤和邀请，准备离开家乡前往巴黎之前。在此之前一年，兰波已经数次试图前往巴黎，但每一次都尴尬地结束行程，第一次是1870年夏天，兰波首次离家出走，但是刚到巴黎，一下火车就被警察逮捕，因为他身上既无车票也没有钱，接着便被送进监狱，几天后才在兰波的老师伊藏巴尔的干预下获释。第二次是在1871年2月兰波终于来到他梦寐以求的大都市巴黎，但是兰波举目无亲，几天之内就落入悲惨的境地，他弄不到食物，天气又冷得出奇，他只得和流浪汉一起睡在桥下或是驳船上，像所有试图迅速征服世界的莽撞少年一样，他的首次巴黎之旅暗淡收场，他找不到任何知音，只得在饥寒交迫之中独自徒步返回家乡。



可能是意识到自己闯荡的资本还嫌不足，回到家乡后，兰波比以往更勤快地到图书馆看书和写作，在几个月时间内，兰波迅速完善了有关诗歌的思考，5月15日，兰波寄出了给保罗·德梅尼的信，日后这封信被称为“通灵者之信”，在这封信中，兰波以年轻人特有的狂热和自信谈论着诗歌的历史——别忘了那时兰波还是一个无名的少年渴望着征服成人世界和诗歌界，信中惊世骇俗的言语部分动机可能来自于此。可是以下几段话确实惊人地体现了兰波早熟的才华，而且亦预示着兰波将来诗作的基本形态：“想当诗人，首先需要研究关于他自身的全部知识；寻找其灵魂，并加以审视、体察、探究。”“必须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者；他寻找自我，并为保存自己的

精华而饮尽毒药。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与众不同，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因为他达到了未知！”与此同时，兰波创作出他第一批杰作——《惊呆了的孩子》、《蹲着》、《失望的心》等，他将这些诗寄给当时的一些成名诗人，希望得到回应。期待中的赞赏终于在寄给魏尔伦的信发出不久后来到，魏尔伦立刻为这些诗折服，并很快回信告诉兰波他欣赏这些诗作，认为诗作者本人“不可思议地带着战争武装”，也就是说随时准备从事新诗歌的战斗，他并且准确嗅到兰波的某种本质性的气质：“在您身上，我能感觉到狼人的痕迹。”魏尔伦开始向他的诗友们推荐来自偏远的沙勒维尔的意外诗篇，于是在最后一封信中，大家一致向这位远方的少年发出了召唤：“来吧，伟大的心灵，我们在呼唤您，在等待您。”

一种虔诚的邀约，正符合这位英气少年隐蔽的期待，他知道这次来巴黎，也许不用像半年前那样在大街上流浪，或者捡别人的残羹剩饭来填饱肚子了，而成功似乎也不再遥远。正是在这种对前景乐观的轻快的想象下，兰波在临行前写下了《醉舟》，诗作是他刚刚展开的浪游生涯的诗意写照和残酷预言，那些巴黎的诗人后来在激赏这首诗的同时，可曾体会到某种轻蔑：

一阵战栗，我感到五十里之外，
发情的巨兽和沉重的漩涡正呻吟、颤抖；

随着蓝色的静穆逐浪徘徊，
我痛惜那围在古老栅栏中的欧洲！

也就是说，巴黎不过是他流浪中的一站而已，对于文人圈的封闭和无聊，兰波似乎早有预感，并在到达之前就宣布了离别的宣言：

——可我伤心恸哭！黎明这般凄楚，
残忍的冷月，苦涩的阳光：
辛酸的爱情充斥着你的沉醉、麻木。
噢，让我通体迸裂，散入海洋！

是的，在去巴黎之前，兰波已经在梦想着海洋，因为它的浩渺和深不可测——它是人世的必然归宿，至少兰波一直这么看。到巴黎之后的几年光景，传记作家们做了精细的刻画，这是因为身在文人圈中，许多人都留下了关于这位少年的文字记录，让我们看看魏尔伦对兰波的最初印象：“一张名副其实的娃娃脸，胖乎乎的，面颊红润，身体显得瘦高，像一个还在长身体的冒失少年，由于正处在变音年龄，他的嗓音忽高忽低，而且口音很重，就像在说方言似的。”在兰波到达巴黎不久，魏尔伦特意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兰波去他朋友卡尔雅画室的画室，好让卡尔雅将年轻诗人的形象永久保存下来，这就是那张被广泛运用在各种兰波传记和诗集中的兰波照片，的确这张照片最为贴近人们对于意气风发的天才少年诗人的想象：在椭圆形的画面上，兰波略显柔弱，但穿戴很体面，显然是为这次拍摄特意准备的，头发精心梳理过，但是有几缕头发并不那么驯服的倒向一侧。他的眼神令人难忘，望向右上方，悲怆中带有几分高傲——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能从这眼神中读出杰出诗人共有的矜持和锐利。联想到兰波生前十年在红海沿岸的游历，我们所能找到的不过是兰波用自己的相机拍摄的几帧模糊的照片，据说用的是很糟糕的显影水的缘故。兰波的后期经历也和这些照片一样隐没在模糊的热带背景中，让一吕克·斯坦梅茨著的《兰波传》对兰波离开文人圈之后的经历做了细致的考证，所占篇幅也有两百页之多，但是其中却很少有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人们甚至不清楚兰波是否和女人有过长期的亲密关系（一种说法是没有，而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说法则是兰波对东非各种地方方言的通晓，来自于他枕边一本又一本的“活字典”——当地女人）。大量自相矛盾的说法成功地将成年兰波的形象定格在兰波自拍的那几张模糊的影像上，如此兰波作为天才少年诗人的形象则得以完美的保存。这样的效果并非出自兰波的预谋，但是兰波后来决绝的抛弃文学抛弃文学界则间接促成了这一命运。当你真的不在乎某种东西的时候，它反而象狗一样地追随着你，文学史不也是如此吗？对这一点，兰波倒是早有认识，后来当他常年羁留在东非时，对于所有从巴黎传来的文学界对他作品的激赏都断然表达了自己的不屑。

到巴黎后的几年，兰波传记有着翔实的记载：他起先寄住在魏尔伦家，但很快即把魏尔伦家搅得一团糟，这一时期所有的证言都在描绘着一个粗暴、焦虑不安、性格极端的兰波，一个恶作剧者。不久，众所周知的是魏尔伦和兰波好上了，这一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同性恋者开始了他们相互折磨的恋情。当时，魏尔伦 27 岁，新婚不久而且很快要做父亲了，可是“狼人的痕迹”显然使他产生强烈震动，并对自己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深感鄙夷（他在政府部门任职，且和妻子一起住在富裕的岳父家里）。尽管对自己年轻的妻子玛蒂尔德怀有某种愧疚，魏尔伦最终还是离家出走，和兰波百无聊赖地浪游比利时和英国。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两位诗人对于社会道德所持的决绝的嘲讽态度，他们在布鲁塞尔时，玛蒂尔德和她母亲前去劝说魏尔伦回巴黎，魏尔伦似乎被这对母女的诚意所打动，答应和他们回去，可是当火车在比法边境，旅客们下车交验护照时，魏尔伦却就此失踪。列车要启动时，她们焦虑地在车门处探出身子往外看，却看见魏尔伦正一动不动站在月台上，兰波在他旁边，魏尔伦把帽子狠命扣在脑袋上，向她们打了一个讽刺性的告别手势。

他们继续漫游，极为微妙的默契心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神秘、色情、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也融合在他们的关系之中，就像他们的躯体和文字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样。两人为社会不容的关系给他们的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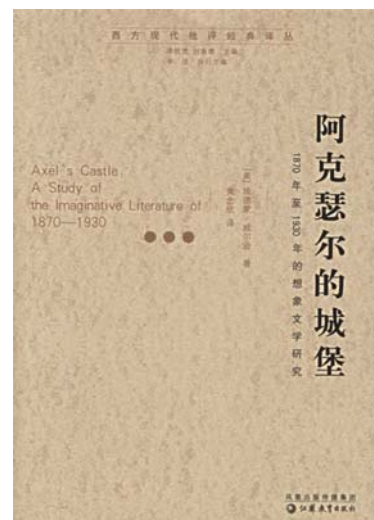
带来意料中的张力，并使他们天生的诗人激情找到了一个突破口。魏尔伦写给兰波的诗坦率得惊人：

狂热愚蠢得可爱，
有趣的妄想，故作恐惧样，
我既是受虐待者又是国王，
我生象雄鹰飞翔死象天鹅悲伤！

你这个嫉妒者在向我示意，
我来了，是一个完整的我！
尚未得到信任却朝你爬去！
到我背上来，随你践踏吧！

相较而言，魏尔伦在兰波诗中则要模糊很多，而且常常和兰波猛烈的内心沉思纠结在一起。兰波最有名的诗《地狱一季》注明写于1873年4-8月，那正是魏尔伦和兰波关系的动荡期，他们在相处后期不断发生争执，1873年7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魏尔伦枪击了兰波，兰波手腕受伤，魏尔伦则被判入狱两年。从7月下旬开始到整个八月，兰波在他偏僻的家乡罗什村埋头写作，最终完成了这部杰作。这是文学史上少有的猛烈之作，通篇语调铿锵，似乎对世界抱有极大的仇恨，但这仇恨转瞬又融入更为远大的背景中，被某种奇特的扭曲的崇高感所吞噬。所有的句子都很强烈，他的声音清晰可辨，怒气、厌倦以及宏大的气魄在孤独的状态中喷薄而出，宛如一枝枝就要离弦的箭簇，射向自身、伸向上帝、也顺带射向魏尔伦（“我们完全有理由去鄙夷那帮家伙……那是侵蚀我们女人清白与健康的寄生虫”），当然这时候目标指向已经并不重要，语言落地生根成为自己的主宰。诗中不乏对灵魂对宗教对世界诗性的思考，但是它仍然脱不掉一个莽撞的少年想要去冒险的底色，他似乎看到未来的幻影，或者这原本就是他重新出发的宣言，整个世界如他所愿静卧在他眼前，任他驰骋——一种野蛮的快意：他想成为工程师、旅行家、获得自由的神灵。所有对兰波后来的生活状态略知一二的人，看到《地狱一季》中这样的诗句都不免要惊讶，因为那疯狂的诗句正是兰波后期生活的真实写照：“我的一天已经结束，我就要离开欧洲。海风将在我胸中燃烧，偏远地区的气候将要使我的皮肤吹成棕色。游泳、打猎，尤其是吸烟；畅饮金汁般的烈酒，——就像我亲爱的祖先围在篝火边的时候。”“至于建立幸福，家庭幸福，不，……不，我不能享有。我太软弱，太不专心。生命因劳动而盛开，这是古老的真理：可是我，我的生活还不够沉重，它远在行动之上飞流缥缈，在这世界亲切的顶端。”“我将拥有黄金：变得粗鲁和懒散。会有女人们来照顾这些从热带国度返回的凶悍的残疾人。我将参政，将被拯救。可现在我被诅咒，我憎恨祖国。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躺在沙滩上，独自酣眠。”

让我们掠过琐碎难捱的生活，直接来到上述诗句指向的终点。在这期间，兰波也曾怀揣诗篇重返巴黎和伦敦，试图重获诗歌的荣光，但是遭受的冷遇远多于热情（愚蠢的人们总是对眼前的杰作视而不见），最重要的是，在《地狱一季》中隐隐透露的厌倦感迅速膨胀，这使他最终遵循他早年放逐的“醉舟”的指引去往更遥远的亚洲和非洲，最初几年每年冬天他还会回到家乡过冬，但是在他逐渐熟悉异域的生活和获得足够金钱养活自己之后，他就连续十年呆在荒僻的阿比西尼亚一带，在毫无特色的几座城市（亚丁、哈勒尔、绍阿）之间穿梭，在《地狱一季》中显然还是幻想的景象——如展现在他眼前，当异国风情真正成为他日常生活习见的景象时，他却依然保持沉默，只是在给家人的信中用公文般的笔调加以简单的描画，他似乎真的来到世界的顶端，那里诗意褪去它最后的神秘，遗落的只有痛苦——他早在年少的习作中就预见过的那种痛苦。1891年兰波的腿疾开始加重，经常痛得他难以入眠，他以为和过去一样凭借自己的固执和粗野的意志能把疾病击倒，可是这一次病痛有点与众不同，“膝盖已肿起来，肿得象拳头那么大，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兰波意识到自己必须返回了。1891年4月7日，早晨六点钟，在他雇佣的16个脚夫的簇拥下，兰波离开了沙漠边缘的小城哈勒尔，踏上艰苦的征程。兰波躺在担架上，像一个半死不活的人，脚夫每迈出一大步发出的颤动都会让他感觉非常疼痛，经过十天的跋涉（第二



天兰波在无遮蔽的情况下淋了整整十六个小时的雨)，跨越 300 公里的荒漠地区，最终艰难抵达泽拉港，过了两天，他乘船前往亚丁。经过诊断，5 月初，兰波乘船前往马赛，轮船在海上航行了十三天，兰波则在痛苦中熬过十三天——当兰波透过轮船的舷窗看到无比无际深黛色的地中海时，他是否还记得，那就是他年少时放逐过“醉舟”的大海？在玛赛的医院，兰波的病腿被截肢，他又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可是他的疾病没有好转，7 月兰波乘火车返回家乡罗什村，正是在那里某间阁楼上他写下过杰作《地狱一季》，写作《地狱一季》时顺便在桌面上刻下的十字架现在仍清晰可辨。可是他的病情在日益恶化，一个月后在妹妹陪同下，兰波又回到马赛，心中惦念着重回亚丁，11 月 9 日，兰波向妹妹口述了一封给法国轮船公司经理的信，信中写道：“我完全瘫痪了，因此我想早点登船，请告诉我几点钟应把我抬到船上去。”——冥冥中，他是否知道那船就是萦绕他一生的“醉舟”呢？第二天兰波去世。

历数兰波最后一年的病痛和死亡，让人觉得难受，可是这过程似乎也有种仪式感——他早年诗作最后完成的仪式，只有杰作才能配得上这一仪式的庄严：“躺在无年龄、无情感的陌生人中间……我随时可能死在这里……恐怖的回忆！我恨苦难。”琐碎的兰波宁愿将其埋入沉默的生活，似乎在残忍地期待这死亡的时刻，美妙的诗句终于脱离肉身的羁绊，“随心所欲地在灵与肉之中获得真理”。但是写作和生活永远是互为因果的，早年的诗作使得兰波后来的远足和贩卖军火的生意行为似乎也隐含有深意，而这种生活又为他的诗作添加了最神奇的注脚，令到诗中乍看有点缥缈的意象终于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中。一切的幻念都比不上死亡的虚无，一切的虚无又裹挟着日常生活的庸常和沉闷，兰波的一生正是与其对抗的一生，先是用笔，然后是用他整个的生活和身体。虽然他最后不可避免败下阵来，但是它印证了人类的勇气和存在的意义——哪怕是瞬间的意义。

没有比埃德蒙·威尔逊的评价更准确的了，这位美国批评家曾在《阿克塞尔的城堡》一书中，以激赏的语气评价兰波的一生：“如果行动可以与写作比较的话，兰波的人生似乎比他同时代的象征主义作家更为令人满意，比那些后来的象征主义作家更为理想，因为他们只是终日留在家中创作文学作品。与其说兰波找寻的是遥远的东方，不如说他找寻的是蛮荒状态与理想……他的事业有暴力性，有道德关注，又有悲剧的完整性，让我们觉得已经看透了人类灵魂的本质，只剩下最坚定的诚意，以及最高度的能力与自控力。”

[法]让-吕克·斯坦梅茨：《兰波传》，袁俊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2 月，59.00 元；[法]兰波：《地狱一季》，王道乾译，花城出版社，10.8 元

BOOK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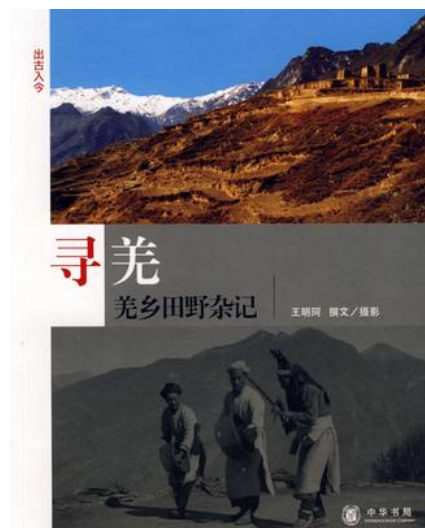
一点常识

特约撰稿人 罗四鹑（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眼睛在天堂，身体在地狱，灵魂在故乡”，一位刚从西藏回来的朋友在喜庆的饭桌上，用这句话幽默地概括她在西藏的感受，话音未落，集体喷饭。不错，这就是在高原的感觉，也应该是这种感觉，如果你有高原反应的话。然而似乎又隔了一层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对于在百联又一城吃着日式自助餐人来说，西藏，只能是一个形容词：神秘、圣洁、永恒，或是灵魂吧。那些藏在褶皱中的村庄和生活的人们，永远停留在历史的黑洞中。

八月在康藏旅行时，听同行人说台湾学者王明珂碰巧也在那里考察，但在一个县的面积就上万平方公里的甘孜，这种碰巧似乎并不意味着能有幸相逢。好在另一种相逢不会被时空阻隔。《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王明珂，中华书局，2009 年 7 月）几乎让我可以想见王明珂是如何穿行在那片高原的褶皱中的，穿行在高山深沟之中。

1994 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并在驰名国际学界之历史语言研究所获得终身



聘职的王明珂，首次踏上大陆土地，“由北京到西安、西宁，一路上造访各地考古与民族研究机构，到处递出我印着‘哈佛大学博士’的名片，卖弄着我在西方苦读有成的学问。直到一天，我来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见到我硕士、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至此，他的学术生涯发生了“令人振奋的转变”，“面对真实的羌族，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于是此后到2003年，这十年间（除了1999年我身在美国），我每年都在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在真实的‘人’与‘社会’面前从头做一个学生，重新寻找古代羌人与今之羌族”。《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便是他十几年寻羌之旅的见闻记录，介绍了生活在深山沟寨中羌村民众的生活与沟中的文化和传说的点点滴滴。

汶川大地震之时，王明珂《羌在藏汉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5月）的出版，无意中让这本学术名著带上一份悲情和纪念。作为这部著作的副产品的《寻羌》，虽少了学术上深刻，但却更为有血有肉，更让人歆歆感慨——它打开了那些似乎永恒的黑洞，将那些藏在山沟褶皱中的秘密生动而真实地展示出来。“这不只为了纪念一些骤然消逝的过去，而更希望借着它来呈现羌族的独特之处——它们如一面诚实的镜子，映照出人们难以察觉的自我本相。”

因此，与《羌在藏汉之间》相比，这本《寻羌》无疑更适合我这个外行阅读，也能纠正猎奇者我的一点错觉，或是自我陶醉或自我欺骗。诚如王明珂在后记中所说：“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事实上，我从羌族那儿受到再教育：没有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没有一种各地羌族能用来彼此沟通的羌语，也没有一种共同的羌族文化。羌族似乎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嘲弄着那些刻板学术方法与知识的虚妄。”

虽然，对于我来说，这种变迁和幽默有些让我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失望和尴尬，但我得承认，王明珂老师的话绝对正确。在阿须草原，年近70岁的阿尼老人给我们说唱完《格萨尔》后，这位据说是目前四川藏区已知的最年轻最受欢迎的民间艺人，有些笨拙地为我们递上他的名片。明黄的名片上，用红字印着他的三个头衔：“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格萨尔说唱家”、“藏族男高音歌唱家”。当我们表示钦佩时，阿尼的眼中掠过一丝得意。

这段小插曲，让我想起《寻羌》中记录的民国初期学者黎光明的一段田野考察笔记：

杨喇嘛是瘦瘦的一个身体中平的人，口下倒栽着一股花白胡子。他名慈争顿真，但是他已经讲究到使用名片，右方还题“松潘灵宝寺喇嘛”。他递名片给我们时，解释道：“林波寺要翻作灵宝寺才恰当，因为壬烹（林波）原是宝贝的意思。”马大爷却很不同意他公然吧喇嘛二字印在名片上，因为“他哪里进过藏来？怎么配称喇嘛？不过一般人抬举他，称呼他喇嘛就是了”，这是马大爷早就对我们谈过的。

我们把我们的名片递给杨喇嘛以后，他在袋中掏出一只铅笔，在我们的名字旁边注上西番音；同时，马大爷向我们努一努嘴，使个眼色，意思是：“瞧！这怪物公然玩这般讲究！”杨喇嘛既知道孙中山，并且听说过有蒋介石，但不知有南京也。更可惜的是他问我们道：“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到底谁个的本事大？”

对此，王明珂说到：这段文字虽充满戏谑，但当时这位喇嘛的作为与黎光明的偏见均跃然纸上。为何那时以为松潘的喇嘛知道使用名片——某种新事物——是可笑的事？以我自己来说，为何当牟尼沟一位年轻喇嘛在接待我时不停地接手机，这样的举止也让我觉得荒谬可笑？或者这是因为，我们对“少数民族”“边疆”的认识都被一些刻板知识所塑造——他们是边远落伍之人，因此与一些新事物不相称，他们又是我国同胞，所以对一些新事物该有常识。

不过，对于黎光明这位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期的研究人员之一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完成的，被认为“学术价值不高”而被尘封七十四年未出版的《川康民俗调查报告》手稿，哈佛大学毕业的王明珂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对于早已熟悉充满拗口的学术词汇、艰涩的西方理论以及故示客观之人类学论文的我来说，黎光明田野杂记式的报告却是十分清新可人。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主观偏见，更难得的是在那年头，他可能未曾听过‘社会结构’，因此他不会以社会结构、模式来忽略个人。相反的，在他文中每个大小人物都活跃纸上。”“我读过许多中国近代史专著，熟悉大小史事及其前因后果，但没有哪一本著作如黎光明的报告那样给我一种身在历史中的‘感觉’。我也读过许多人类学著作，它们中也没有一本如黎光明的报告那样能有血有肉地描述‘人’，包括文中不经意流露的他‘自己’，而让我感觉身在当时社会之中。”

或许，用王明珂的这些话来评价他自己的田野笔记有些不太适合，但我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话。我想，如果想亲身感受羌人和他们的山寨，最偷懒也是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读这本笔记吧。

而对于在这本田野考察笔记中有些突兀的陌生的黎光明，王明珂还花了不少文字介绍和感慨：

黎光明离开史语所后，有几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便投身于军政——这才是他以及他周边的朋友所热衷的革命事业。年轻时黎光明曾与一帮朋友从事反军阀学潮，因此被大学开除，而后他们大都进入黄埔军校。黎光明则因信奉伊斯兰教，难以适应军中生活，所以转入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此，他身边尽是整天谈革命的朋友。1929年与他一同到汶川、松潘考察的王元辉，便是这样一个黄埔军校出身的革命青年。1940年代的先头几年，王元辉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十六区行政督察区专员，负责整顿川康边区军政民政，铲除鸦片是他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他的革命同志，黎光明、汪一能，也在这几年分任靖化（今川西金川）与松潘县长。

1942年，王元辉率军铲烟，在懋功（今川西小金）被护烟的会匪、村寨兵勇围困在县城内，赖地方势力出面斡旋才得脱身。1943年，汪一能在松潘铲烟，在安顺关附近被会匪及村寨民兵俘虏，受尽凌虐而死。1946年3月，黎光明刚上任靖化县长才两个月，便设宴伏杀当地掌握鸦片买卖的袍哥头子杜铁樵。以当时的局势来说，黎光明此举几乎是杀身成仁。袍哥武装党徒当晚便围攻县府，次日，县府被攻下，黎光明受害并遭到曝尸之辱。

读到这些资料时，我想起毛老师的父亲杜杰曾对我说“吃万恶肉”的故事。他说，小时候曾听得大人说，那时松潘有个县长“汪万恶”，到处铲除没收村寨百姓种的鸦片。后来有一天，消息传到热务沟里，说是在安顺关那儿抓到了汪万恶，沟中老少都奔到外头看热闹。他说，汪万恶是个胖子，他死了后还有许多人去抢着挖“万恶肉”吃。近五年来，我多次打金川过。金川也就是黎光明死于其县长任上的靖化。我想起汪一能，想起黎光明及王元辉。我想起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致电滞留成都的黎光明，催促他赶紧到岷江上游去做调查，并要他“少群居侈谈政治大事”——又仿佛见到在成都的茶坊里，这一帮青年热切地谈论国事。谁料得到，最后他们多以生命来说明“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望着金川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我想，谁还记得黎光明？这儿的人又是怎么说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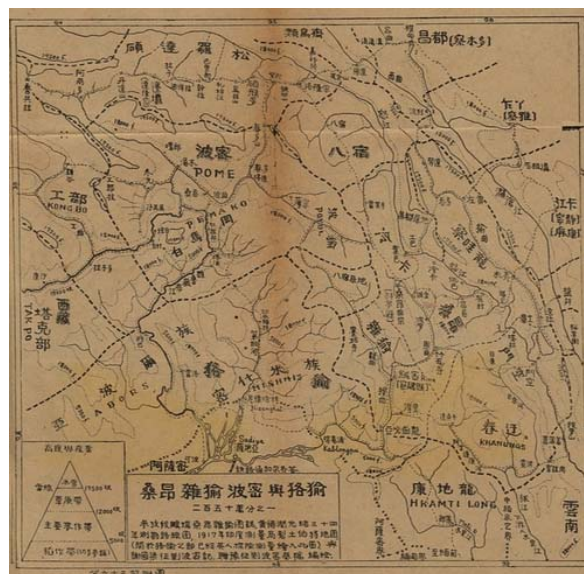
本着八卦精神，在对黎光明以及当时的西康进行强劲搜索后，我还找到一本同样有趣的书：任乃强的《西康图经》。

1921年，接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任乃强从北京回到家乡南充，协助张澜搞地方自治，建立了四川第一所现代中学——南充中学。1928年，在南充中学教授四川乡土史的任乃强出版了《四川史地》一书。由于该书是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四川历史地理沿革的著作，出版后影响颇大。当时，川康边防指挥部的胡子昂处长正受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之命，邀请专家考察康区，以备开发。见到此书后，他当即致函请同学任乃强入康考察，任欣然前往。

1929年初夏到1930年孟春，“自束发受书，偏嗜地理”的任乃强辞去南充教职，首赴康藏地区进行考察，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周历城乡，穷其究竟。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俗、山川风物，以至委巷琐屑鄙俚之事，皆记录之”（《西康图经·自记》）。到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第一手资料。他将其整理成文，分为7类，共300条，取名为《西康诡异录》，从1930年5月起陆续在当时的《四川日报》副刊上登载，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格萨尔王传》的两篇文字。这其中还藏着一段佳话：

在途径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时，任乃强深感当地文化之魅力，停留达三个月之久。他发现康人有着“内地汉人不及的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在闻知当地甲日土司夺吉郎加有三位美且慧的女儿后，便请人做媒上门提亲。夺吉郎加将唯一待嫁的女儿罗珠青措许之。

婚礼按藏汉两种习俗举行，前7天在官寨按藏俗举行，后3天在县府按汉俗举行。婚礼期间除举行赛马、跳锅庄外，每天傍



《西康图经》中的一页地图

晚，人们都聚集在寨廊上，如痴如醉地听新娘的大姐却梅卓玛说唱草地的“蛮三国”，“时读散文，时而韵语讴唱，颇似内地的弹词”。在新娘的协助下，任乃强边听边记，并翻译成韵体汉文，才知“所载尽仙佛故事，与三国演义无涉。”返川后，他将记录下的这段“蛮三国”及其介绍文字刊登在当时的《四川日报》副刊上，成为最早以汉文译介《格萨尔》文字，也让这段汉藏联姻的佳话平添几分浪漫。

返川后，在妻子的帮助下，任乃强陆续撰成《西康图经》（新亚细亚学会出版，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初版）《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此书发表后曾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虽然任乃强的《西康图经》获得的学术地位和赞誉与黎光明尘封的手稿相比有天壤之别，不过，二者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生动有趣，既可以当学术著作看，也可以当作游记来读，仿若能回到那个年代康巴。美中不足的是，我看到的是1932年初版的影印本，这次是身体在天堂，眼睛在地狱了。

王明珂：《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中华书局，2009年7月；任乃强：《西康图经》，新亚细亚学会出版，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BOOK REVIEW 书评

读陈志勇两则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pessoa1935@gmail.com）

之一

还有一位叫陈志勇的画家

读完陈志勇(Shaun Tan)的《别个国家都没有》，想一想，名声这个玩意真是奇怪。这位1974年生于澳洲的画家获得过国际多项大奖，这本书也不是他的第一本书了，然而读之前我依然对他没什么概念——或者说，即使是一个还算关注绘本（这个词不仅太泛滥还太宽泛了，不知道是否合适陈志勇）的读者，对这样一位在业界（姑且这样说吧）享有这样大名声的画家一无所知，而陈志勇的作品又是那种只要你看过就会非常喜欢的。对于那些知道台湾出了个几米的绘本爱好者而言，似乎有必要提醒一句，还有一位叫陈志勇的画家，虽然你可能不知道他，但绝对值得留意，他的书值得一读。陈志勇生长在澳洲，不过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台湾出版。

我是在一位画画并且从事书装设计的朋友那里知道陈志勇的，即使只是在博客上看到两张图而已，已经为他的想象力所折服。一个小女孩，与她黑暗的房间里长大的绯红树，陈志勇作品，余光中翻译。我虽然至今无缘拜读这本《绯红树》（据说在台湾都已经断货），但我相信这张图是这本书最high的段落。



我“退而求其次”买到的《别个国家都没有》，是陈志勇最新的一本绘本，整体而言，有强烈的涂鸦风格和短篇小说的味道，15个故事就像15个短篇小说。我非常非常喜欢《艾瑞克》。陈志勇的父亲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母亲则是澳洲人，他创造的艾瑞克这个所谓的“外国交换生”，可能代表了作者的某种视点，某种生活经验，然而这位能住在茶杯里的艾瑞克，关注地上小东西、让人火大的艾

瑞克，是百分百的捏造——是想象力。这和开篇的《水牛》、《回流》、《爷爷的故事》、《枝条人》等篇一样，具有浓重的文学味道，同时，既能给人温暖，但不甜熟。《我们的探险》像一篇成长小说，并且有着浓重的人生阴影，这就不止是温暖，

而有些悲哀了。其实，在陈志勇颇显“技术性”的包装之下——比如涂鸦，剪贴（《无情雨》、《自制宠物》），甚至利用剪报直接呈现（《失忆机》）——更多的是对这个机械的、冷冰冰的现代社会的的。这不是读者可以感到愉悦的东西，但却让人不能忘怀。陈志勇始终没有顺应读者的潜在需求，提供一个所谓的心灵栖息地，反而显示我们生活中的失去、失败、不安、灰色，可能仅仅是一种色调，但是他毕竟泄露了人与这个现实世界的格格不入，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格调，一种境界。

《警觉但不用惊慌》是一篇带喜剧色彩的寓言，说的是这个“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洲际弹道飞弹时”，“我们只需要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擦洗我们的飞弹”，“有许多人已经开始为飞弹涂上不同颜色，甚至还自己设计装饰图案，例如蝴蝶啊、花啊等等”，还有——“我们在圣诞节时还习惯在它们上面绑上灯泡”、改装成狗屋或者披萨烤箱……也许，这确实像一出讽刺剧，不过我最近读到美国游记作家比尔·布莱森的回忆录《闪亮的日子》，可以看出陈志勇并非无稽之谈。布赖森的回忆录写到1950年代的美国“每周都有形势变得更好、更快、更方便的兴奋消息传来。没有什么是荒谬、不值一试的”，其中就包括“1959年6月8日清晨《得梅因纪事报》明显带着一丝兴奋和骄傲报导：邮件可以通过导弹传递。该文章向我们保证，很快装有邮件的火箭将会从美国上空一闪而过。人们该想象得到，特别投递的邮件每隔一小时呼的一声，倒插在我们家后院的样子”。最后一句正是陈志勇笔下的国际情景喜剧。

之二

《绯红树》的忧郁

在7-11门口收到台湾旧书店寄来的陈志勇绘本《绯红树》，立即借了店里的剪刀拆包装，却从书里掉出一本小册子，“关怀忧郁症专刊”。我这才看清楚书封上那个小女孩一脸的疲倦。《绯红树》不是我看过的第一本陈志勇的绘本，对于他画风的幽暗特征早有了解，不过，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是结尾两张图，happy end，完全没有把它跟忧郁症联系起来。

忧郁症似乎正成为一种惯见的都市病。在附赠的小册子第10页，是《儿童忧郁症——忘记微笑的心灵》。我发现《绯红树》里的小女孩，果然只是在那结尾微笑，微笑才是快乐的，而我们可能都没有多想忘记微笑跟忧郁之间的关系。关于一个孩子的孤寂晦暗的心情，似乎是难以想像的——小孩子也会不快乐吗？陈志勇正是以他那种幽暗的画风，绘出了忧郁症的各种面貌：那么灰暗，那么绝望，那么无力，那么脆弱。可以说，作为艺术创作，这未免太真实了。假如我们将陈志勇的绘本与几米的相比，同样关注心灵，后者是明亮的、温暖的，甚至近于甜熟的，可以让读者即刻获得力量，而不必邀请那些不相干的人们细致真实地体验一下“忧郁”这个名词。在陈志勇的绘本里，类似的温暖极其少，但也并非没有，作为某种象征的绯红树叶，出现在每一张图画里，直到在最后一页成为火红的一棵树。应该说，那些只有绯红叶子而没有绯红树的日子太多了，甚至没有边际，《绯红树》也没有一定指向快乐结局的意图，这似乎可以说，读这册书，并不能使人特别感到“救赎”，能够汲取力量，反而充满了悲伤，因为这个小女孩的快乐，“亮丽而又耀眼/悄悄地等着”，更像是一种偶然，那只是“你梦想的那样”。我理解为这是陈志勇及其作品的深刻处。

《绯红树》2003年由台湾和英出版社出版，2008年第3次印刷，文字、图片由陈志勇创作，他是在澳洲长大的华裔画家，此书中文由诗人余光中翻译，文字简短，像一首诗：

有时候一天开始什么都没有指望
事情是越来越糟
阴影啊将人笼罩
谁也不明白为什么
这世界成了聒掉的机器
毫无意义，不讲道理
有时候你等啊



等啊等啊等啊
等啊等啊等啊
可是什么也不会发生
于是所有的烦恼一起上身
美妙的事情都被你错过
噩运呢你却休想躲过
有时你根本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
不知道你该做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这一天的下场啊糟得像起头
可是突然间那东西就在你眼前出现
亮丽而又耀眼
悄悄地等着
正如你梦想的那样

陈志勇文图：《别的国家都没有》，郭恩惠译，台湾格林文化 2009 年 2 月版，新台币 380.00 元。

陈志勇文图：《绯红树》，余光中译，台湾和英出版社 2003 年 7 月初版一刷，2008 年 6 月初版三刷，新台币 250.00 元。

BOOK REVIEW 书评

法兰克福学派的诺依曼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上海，sunchuanzhao@yahoo.com.cn）

《上海书评》6 月 21 日刊出了徐贲对扬——维尔纳·米勒的访谈《扬-维尔纳·米勒谈德国政治与知识分子》。访谈中，为了使中国读者能更好了解扬——维尔纳·米勒已有中文版的《危险的心灵》、《另一个国度》这两部著作，徐贲的发问有的放矢，米勒的回答也集中在几个中国读者关注的问题上。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国学人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魏玛民主体制为何会酝酿出一个希特勒政权的毒果？米勒回答这个疑问时，强调“魏玛的宪法是高度民主的，也很进步，但是正如 Franz



Neumann（魏玛时期的著名律师）在当时就指出的那样，魏玛宪法也许更像一个条约或停战协定。当时德国的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存在着敌对的关系，宪法起到的是在它们之间调停的作用。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接下来，米勒又说到这个重要教训：“二战后人们还从体制建设和宪法条文来总结魏玛时期的政治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民主要捍卫自己，就必须限制极端主义的党派或彻底禁止这些党派。纳粹和希特勒就是利用了魏玛的民主体制才获得政权的。”这段话中，米勒提到的 Franz Neumann 及其著述，我国读书界恐怕还比较陌生（网络上粗略查了一下，只有一篇关于专门研究他思想论文：中山大学王晓升《政治自由概念的三个要素——诺依曼对自由概念的分析及其启示》，《探索》2005 年第 2 期）当然，米勒不能喧宾夺主地撇开徐贲所问，

在访谈中详细介绍诺依曼其人，所以，笔者想就自己感兴趣的，对 Franz Neumann 这个人物及学说略陈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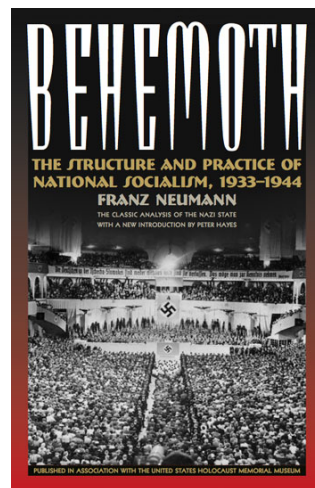
说起来，弗朗茨·诺依曼（1900-1954）也不是无名鼠辈，被德国学界称为与 Ernst Fraenkel、Arnold Bergstraesser 并

列的、德国现代政治学创始人，也是德国最著名的研究纳粹体制的学者之一。诺依曼在学生时代支持 1918 年 11 月革命，加入了社会民主党，1923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以后以左翼工会律师为职业，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与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一起，在学术上与法兰克福学派发生了联系。纳粹上台后，诺依曼先是流亡到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在卡尔·曼海姆和费边派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法所支配的历史时代”论文，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以后，他又前往已经迁移到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继续他的政治学的研究。二战结束前后，诺依曼为战时临时成立的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工作，不仅曾参与诺依伦堡审判，为审判收集、整理 22 名战犯罪行的证据，起草对戈林诉状，还为战后德国非纳粹化做理论上准备。1948 年他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政治学教授继续他的学术生涯。1954 年在瑞士因车祸去世。

1940 年代初，社会研究所成员就研究纳粹体制作了分工，霍克海姆、阿多诺主事哲学，弗洛姆从心理学入手，而诺依曼研究侧重政治经济学的领域研究。最后，该群体研究纳粹体制的众多的成果中，影响最大的要算诺依曼 1942 年完成初稿的《比希莫斯：民族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有人译成“巨兽”，也有译成“怪兽”的）。书名“Behemoth”一词，是受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启发。犹太教的关于巴比伦的起源传说中有两种巨兽，统治海洋的是“利维坦”、统治陆地沙漠的是“比希莫斯”。两者都是使世界混沌的怪物。诺依曼隐喻所谓“国家（民族）社会主义”是“无国家、无秩序、无法律、无政府的统治”。魏玛时代提供的保护人的自由的不完善的缓冲和防御机制都不被摧毁了。诺依曼在德国接受过良好的法学训练，所以，流亡英、美后的研究中，他表现出对魏玛宪法、政体及后来纳粹体制下的法律制度本质的关心。诺依曼认为自由主义主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形式，虽然提供了一种人权保护，而且对于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来说，它还体现出具体的自由和人格保护的真实性，但是不能忽视其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逻辑上依然存在的危险性。因为法律的背后总是由人在起作用。所以，执法实际上是一种私人保护取代了法制保护。法西斯制度是显示了这种发展趋向的极端，其他非法西斯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可能朝这一方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他在战后研究的论述中更加明确强调法律的道德基础。诺依曼认为法律一般在道德、经济和政治在三个层面发挥功能的。道德价值统帅经济与政治，因为国家权力是通过法律来体现，而法律规则都是由道德价值决定的。在经济领域，法律作为最高理性的形式，让人知道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和权利，免于违法被剥夺权利和财产；政治上，法律通过国家法治发挥其普遍功能。但是，无论经济规则、政策，还是法律本身，最后都要受到道德价值的规制，因为法律体系是按照道德价值建立起来的。传统的自由主义企图通过法律来限制权力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但是政治、经济活动中许多人为非理性操作的东西，不是法律能概括进去的。非理性的东西、人为的非理性行为，经常与法律、理性发生冲突。法律受权力支配，不能约束权力。最后解决的办法无非是两种可能：以特殊状态的名义，把它作为法律管辖的例外；其次，干脆中止或废除法律。他举例说，纳粹时代没有废除魏玛时代的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只是通过国家权力强化意识形态来对宗教加以控制，就能削弱宗教影响力，迫害神职人员。

因此他认为魏玛体制的教训之一：即使民主社会中的司法独立、司法自由，最终也可能会被政治和经济权力所消解。因此，在公民具有认识自由和意志自由，并且在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的法律基础——道德价值的前提下，才能通过法治，保证公民真正的自由。可是，个人意志自由，也必须有一个自律的前提，即不能妨碍、限制共同体中他者自由。米勒在访谈中谈到诺依曼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这中间所谓“同质性”就是指成员都有这种自律的前提，其成员失去这样道德自律的社会，决不是民主社会。个人法律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巨兽》中对纳粹经济体制也作了分析。诺依曼否定纳粹政权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说法，他以数据来证明纳粹进一步强化了魏玛时代的卡塔尔的垄断，插手所有经济活动，把全国组织为一个经营网络。这样的垄断经济也是指令性经济的一种形式——叫做“权威垄断资本主义”。因为产业必须保持与其政党有同一目标，所以，在以政治统帅经济的独裁国家中，政治权力必定要在经济领域中、在产业中占据了牢固地位。纳粹甚至可以立法随意完全剥夺犹太人的私人财产。另一方面，诺依曼认为，理性的科学技术既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内发生的，那么很难说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发展的活力。从长远来看，科学技术的理性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必然追求最大利润这两点，与纳粹本质上的非理性最终要产生不可以克服



的矛盾。而坚持理性的知识分子与这种极权垄断资本主义也必然是对立的。

与法兰克福学派中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成员不同，诺依曼认为政治自由应该优先于经济自由。他认为，财产权利或作为自然权利、或作为法律赋予的权利，确实是保护个人自由的一个条件。但是，他也指出当这种财产权妨碍他者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时候，也必要加以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自由并不能取代政治自由。

我国读书界、出版界，随着学术界的热点而转向，1990年代是经济学著作热、最近10年来，是法政著作出版热。尽管像米勒所说：“将某一种历史经验和教训转换到另一种环境中去，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而，我们在关心所有制、法制变革的时候，读点弗朗茨·诺依曼著述，能听到一些特别的声音，不无裨益。

INTERVIEW 访谈

阮义忠：眼由心生

采访整理 张素闻 （广州， zhanglookat@126.com）

阮义忠，中国摄影教父，创办《摄影家》杂志，最早介绍国内外优秀摄影师和摄影的第一人，享誉国际。主要著作有：《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面对摄影大师》、《摄影家西游记》等；个展及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四季》、《手的秘密》、《有名人物无名氏》、《正方形的乡愁》、《失落的优雅》、《恒持刹那：随证严法师行脚五年》；摄影图文故事：《寻找希望的种子》、《期待希望的新芽》等。阮义忠先生是陈丹青教授1995年便写信表示仰慕与尊敬的人，丹青先生甚至写过一篇《向阮义忠致敬》。广东省美术馆王璜生先生认为：“阮义忠部分地改变了中国摄影一个时代的景观和面貌，而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他恰好处在一个中国当代摄影演进的时空转折点上。”



摄影：姬东

一群女生在阮义忠的作品《人与土地》前按照照片中的顺序排队留影，一个父亲指着阮义忠的摄影告诉儿子：“土地是我们人最重要的存在。”读他的书长大的后来的摄影师们，总会被他的镜头与笔墨间的人性与爱打动：“有些人喜欢记录别人的苦难和丑陋，我不会拍摄这样的照片。如果我会按下快门，只是因为我一定在其中发现一种还不是那么糟糕的东西。”

他的摄影作品上没有残忍的画面，看过阮义忠的摄影作品的人，无不被他镜头下的温暖以及不经意的天真跳跃的欢喜还有内在的慈和而感动：台湾的民俗风情、早已消失的旧日时光、欢腾的孩子们、高贵庄严的法师等等。《失落的优雅》画面感很强，《人与土地》之间，有浓郁的乡情与热爱，《有名人物无名氏》

里，他拍过新婚蜜月中的探班胡因梦而又无所事事的李敖，拍过舞蹈家林怀民、作家琼瑶、演员萧芳芳、蒋碧微等等名人，而皆给人完全不一样的印象，《手的秘密》让人看到手的奇异美妙，而他对儿童题材的特别关注总能看到纯真与明朗……有人说阮义忠是——“一位充满和闪耀人性光辉的摄影大家，同时又不时地流露出天真的童心和慈祥的佛性。”

而当茹素八年的阮义忠和夫人瑶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还是大吃一惊：年近花甲，衣着朴素，犹如农民，自然而大方，几乎看不出任何与艺术家有关的形象，而就在这种平常的相貌中，看得见教授满眼的欢喜与矍铄的精神。

阮义忠1950年生于台湾宜兰县的木匠人家，从小就会使用刨刀、凿子等工具来做玩具、便当盒、铅笔盒。小学到初中时的课余时间，都在菜园里操作农事。劳作十分辛苦，阮义忠开始思考命运，想要离开那片土地，喜欢读书画画，想成为艺术家。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但机缘很好，服完兵役后去到杂志社任摄影记者，因此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借相机回到现实。

刚开始，阮义忠在《汉声》杂志社，后来去《家庭月刊》，拍明星化妆，师傅炒菜，电器怎么修，保险丝断了怎么办？

琐碎的事情没有让阮义忠丧失对摄影的信心：“没关系，我有天地，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很多值得了解的小乡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买张台湾客运车路线图价目表，发现台湾，从车子可到的终点开始，孤独地旅行，去了解和认识世界，六年走遍了台湾的偏远地区，十个原住民族没有一个漏掉的。他的所有经典作品几乎都是此时留下来的足迹。

1999 年，阮义忠跟随慈济基金会的证严上人，记录 9.21 地震中慈济所援建的 50 所学校，就在记录这些学校的重建过程中，被证严上人的慈悲与智慧所感召。2003 年依止证严上人，陆续为慈济拍摄了《恒持刹那》及《看见菩萨身影》专辑系列。有人觉得阮义忠的摄影有慈悲心，我忽然想起观音菩萨的“慈眼视众生”，觉得可以用来做文章标题，师母立即反对：“我们只是在学习慈眼视众生。”他们向来把说话当作很慎重的事，不用言语，喜欢用行动表示爱，任何事情都放在同一水平，做好了，小事也意义重大。

为了筹备广东美术馆为他举行的大型回顾展《阮义忠·转折点——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个人》，阮义忠这阵子的工作量是：一大早进暗房，打开音响，边听音乐边放大照片，肚子饿了，出来吃东西，接着再进暗房：“进暗房等于修行，每一个步骤都是虔诚的。我不需要助手，而且养成了做事情的角度、力度、姿势都平衡到这个动作是上一个动作的休息。”

令人惊讶的是摄影家阮义忠竟然是个在生活中做家务的人，他说妻子和儿子都不知道扫把在哪，然后从扫地引申开去，说现在的建筑设计师要从扫地开始和空间对话。阮义忠很善于找不同事情上的相通点，他擦过的窗户，夫人瑶瑶说：“象没有玻璃似的”，而这样的生活技能也是摄影教会他的：“像擦底片一样，用海绵把水痕慢慢吸干，不是擦干，擦的玻璃会有水痕，有水痕不能算是干净。”

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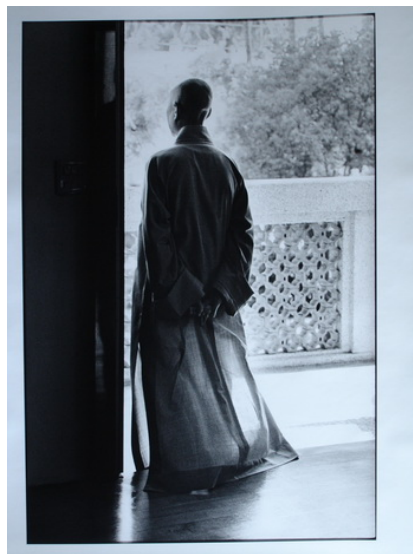
记者问：您对艺术和现实如何理解？摄影这种艺术似乎更依赖于现实呢？

阮义忠答：实际上，艺术来自现实，相机使人先观察理解对象，体会对象，从而表达对象，所以，摄影要学会观看，学会用同理心跟人交往。那个时候的农村，人在土地上生老病死，平凡人不平凡的气质，人性的善良，纯朴生活的一种坚持，丰富的精神面貌，人与人的信任，自然的和谐，台湾农业社会里最珍贵的内涵只留在照片里了。高效率的生活破坏了过去的生活，如何在未来把过去的好找回来？那就是要感恩地球，敬天爱地。这就是我三十多年用摄影所追求的。一张再好的照片，摄影家也只能算是 50% 的创作者，另外 50% 是对象的功劳。摄影家不是全能的，往往是应该为对象服务的。

记者问：如何才是观看之道与摄影之道？

阮义忠答：用心去体会；看到事情的意义，不要太追求属于个人的意向。当你用心体会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表现对方就好了，不要有自我的痕迹；想尽办法显示自我的时候，甚至会冲突。为了使对象更美，只能使自己的心简单；心简单，画面就最平凡，最平凡也最辉煌。对对象要彻底尊重，懂得谦卑；而摄影者最大的责任和挑战，正是仔细观看与发现对象的最佳特质，并将之最适当地诠释。

记者问：如何才能发现对象的最佳特质，将之最适当地诠释呢？



证严上人，阮义忠作品



阮义忠作品

阮义忠答：把时间和空间加在一起考虑，角度、光线、最好状态下的人的精神，乃至哪个快门最好？人与背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次序、比例、加在一起有一种和谐。和谐就是最佳，把自己完全放空，框框只会变成障碍，不管看什么都不要被框住。

记者问：您拍了很多人物肖像，而且，这些肖像和平时人们看到的这些人并不一样呢！

阮义忠：肖像是人对自我形象的期许，拍一个人就应该把他可能的好拍出来，而不是只拍出他当时呈现的状态。李敖那张照片正好是他从监狱里出来，新婚不久，去探胡因梦的班，无所事事，拿着枚叶子做扇子。当时的他是那么谦和自在，所以我就把他拍下来了，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照片，展览的时候，他把它买回去了。那次的四个主题的大展览《告别二十世纪》，作品出售所得全部捐赠给 9.21 地震的灾民。每次放照片时，我都觉得好像是在重新面对过去温暖我的时光。我很感激过去捕捉到的人、事，他们令我感到生命的厚度。

记者问：您曾说：“无论与这个时代遭遇什么，都选择见证时代的光辉而不是阴霾，因为只有那样才会带给未来希望”？

阮义忠答：悲痛中还有希望，真的很苦会拍不下去，照片对对方无帮助，我拍来做什么呢？显“苦象”也要让人能“知苦惜福”，起激励和反省作用，不会拍只是很凄惨的画面，不堪，不忍，好像自己袖手旁观帮不上忙。作为摄影人的价值，就在于图片给人力量和温暖，平淡中的深刻，生命的价值和可贵，照片是整个时代的乡愁。

记者问：您现在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有什么心得？

阮义忠答：教书已变成我生命中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完全无私付出，也不会想要回报，学生用功就好。教书其实是个生命分享，很特别的分享，我教了二十多年了，仍然热情，把自己认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教给学生，毫无保留。上课实在是太开心了，每一堂课我都很珍惜，都像上第一堂课那样认真，也会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从未变质。

记者问：数码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几乎人人都可成为摄影师，而且可以反复修改，创意层出不穷，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阮义忠答：数码相机使人失去等待的神圣与捕捉的谨慎，同时，数码相机大大降低了成本，让人不珍惜材料。不惜物终将导致不惜情，跟拍摄对象的关系就会愈来愈淡薄。我自己是使用传统相机，能按一次快门就不按两次，会提前反省。数码谁都可以拍来拍去，传统相机给人冒险感与神秘感，成功后会有幸运感：还好还好，没有拍坏；是感激而不是侥幸。能感谢就会珍惜，本来是陌生的对象，通过相机而变得亲切。

记者问：您有一本照片集就叫《失落的优雅》，您所说的优雅是？

阮义忠答：克己复礼。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就是最优雅的事情了。现在人和人的沟通都失掉了优雅；地铁里的人不会稍微侧身为他人让路，堵在门口也不管别人是否进得去。进退有据，当止则止，知道分寸，就是优雅。

记者问：怎么没看到您的彩色相片呢？

阮义忠答：曾掉过 150 张彩色照片，无意间掉了，心随时都在痛，痛不欲生，最后决定：从此再也不拍彩色。只有如此才能走出阴霾，有时，失去也是另一种拥有。

记者问：您怎么看待摄影？

阮义忠答：照片是回家路上一步步的脚印，家随时在变，故乡早已面目全非，童年时代跟亲友在一起的记忆才是真正的故乡，被记录下来就是永存。照片就是回不去的家；从某个角度来说，无计算机的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代，有电脑之后，一切不再。

记者问：您对自己的摄影有何期待？

阮义忠答：照片所记录的虽是刹那，却也是永恒，而我们却是一直在变。当你回头看，就可以省思，自己为何会变？变得更好还是不好？希望那些被我拍过的人看到照片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很倒霉，而是会说：“被阮义忠拍到，好幸运。”

OBITUARY 讣告

政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 89 岁高龄去世

作者：希莱尔·伊塔里

译者：吴万伟（武汉，wuwanweione@yahoo.com.cn）

华盛顿：作家、编辑、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周五去世，享年 89 岁。他青年时期是激进分子后来先后抛弃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反文化。



《标准周刊》编辑在网站上宣布了克里斯托尔因为肺癌恶化而去世的消息。“他的智慧、诙谐、幽默、慷慨等精神使得他成为几代思想家和公共官员的朋友和导师”。

克里斯托尔是批评家、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尔布（Gertrude Himmelfarb）的丈夫和《标准周刊》编辑、新保守主义编辑和评论家威廉·克里斯托尔的父亲。

克里斯托尔是 1930 年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很快对社会主义感到厌恶，在 1960 年代新左派兴起后和自由主义决裂，在 1970 年代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支持共和党，这个曾经“对我来说就像参加天主教弥撒一样陌生的东西”。

他是首先从政治上离开家，后来从身体上离开家，在 1988 年到华盛顿去的纽约知识分子。他是个“被现实痛击”的自由派，转向了右派，很多人也加入他的行列，包括未来的共和党内阁官员如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和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和新保守主义的另一个创立者诺曼·波德赫瑞茨（Norman Podhoretz）。

波德赫瑞茨说“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影响力一直是重塑过去 40 年美国舆论气候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他是在过去 20 年帮助让保守主义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的众多思想库、媒体、公司等网络中的旗帜，也是希拉里·克林顿可能说的搞她丈夫的“右派的巨大阴谋”的重要人物。

自由派评论家埃里克·阿特曼（Eric Alterman）在 1999 年写到“欧文·克里斯托尔或许比活着的任何人都更能够享受扭转美国政治文化的尊崇”。

前副总统切尼是他长期的崇拜者，前总统乔治·布什（其政府里有大量新保守主义者）在 2002 年授予他总统自由奖章，表彰他“著作帮助改变美国政治风景的、涉猎范围广泛的思想家”。

周五晚上，布什称克里斯托尔“是推动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

克里斯托尔本人会认为新保守主义是做得很好的，是一个“世代现象”，“更多被吸收进更大的更全面的保守主义。”但是伊拉克战争和糟糕的经济在过去几年里严重破坏了右派的团结和可靠性。

随着巴拉克·奥巴马宣誓就职，克里斯托尔的儿子宣称自由派又重新掌权。

威廉·克里斯托尔在《纽约时报》上写到“一切好东西都要有个终结。2009 年 1 月 20 日标志着保守主义时代的终结”。

和右派的早期倡导者如参议员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和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欧文·克里斯托尔认为他的《国民评论》分析性和思想性都不够）不同，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不是终生的共和党人。他们是从前的民主党人，大部分是教授，因为越南战争、种族关系而与民主党决裂，他们认为那是对公民秩序的破坏。

克里斯托尔抛弃了自由派观点，因为他越来越对林登·约翰逊的“大社会”的失败感到幻灭，该政府竭力要解决的问题如犯罪、吸毒和其他问题都越发恶化。

他们像伯克利等人一样反共，但是他们对政府花费的担心不如对道德和文化议题的担心更大，相信人们需要随着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曾经是学生造反派的克里斯托尔对 60 年代后期的长头发青年感到惊骇。

他写到“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成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这个吃惊的承认产生了深刻的后果。我们是资产阶级，每个人都是，但是更多是出于习惯和本能而不是思考的结果。现在我们不得不决定我们要支持什么，为什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保守主义”不是新保守主义者发明的，据说是社会主义者作家和积极分子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他在 1973 年的关于克里斯托尔和其他从前的自由派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克里斯托尔出版了众多著作。他为《新领袖》和《评论》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评论，出版了几本书，包括《新保守主义：思想自传》，和其他人合作创办了影响很大的新保守主义刊物《公共利益》。

他为《华尔街杂志》撰稿，在 1970 年代为它撰写了系列文章，呼吁企业界为保守派学术研究投资，抗衡自由派政治的“永久智囊团”。

因为得到约瑟夫·库斯（Joseph Coors）、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等人的资助，右派创立了遗产基金会等思想库。克里斯托尔本人是重要的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至少有两本主要的保守派著作是在克里斯托尔帮助下出版的，一本是儒勒·瓦尼斯基（Jules Wanniski）的供应方宣言《世界的工作方式》和查尔斯·默里 Charles Murray 的反福利著作《失去的基础》。

克里斯托尔在纽约大学教书，作为高级编辑在基础出版社工作了几年，在 1950 年代主持反共杂志《遭遇》（Encounter），他说后来才发现该杂志是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

克里斯托尔 1920 年出生于纽约市，刚开始和其他犹太人移民孩子一样热爱读书，和工人阶级结为同盟，在大萧条时期是“看到周围迫切渴望工作而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的孩子。

他后来写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权威下的计划经济的思想似乎是常识而不是意识形态。”

在纽约城市学院，克里斯托尔对上课感到厌倦，但是痴迷于一号餐厅进行的无休止的辩论和讨论。主要是一小撮学生左派，包括后来创办自由派刊物《异议者》的欧文·豪（Irving Howe）、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这四个人都出现在 1998 年的纪录片《说服世界》中。

到了他 20 多岁的时候，克里斯托尔已经从最激进的立场后退了。在二战的时候是在欧洲打仗的步兵团的成员，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对军方表示同情，和战友则保持距离，他认为他们都是“暴徒或者几乎是暴徒”。

他写到“我在陆军当兵的经历使得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发现。用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不同于他理想的版本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完全是异想天开，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是零。”

战后，他返回纽约，被聘担任《评论》的编辑，当时这是自由派刊物，撰写关于宗教和哲学等方面的评论。仍然对市场经济学非常不屑，他是反共的自由派，称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是“粗俗的煽动家”，但是补充说“关于参议员麦卡锡，美国人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和他们一样坚决反共。”

“关于美国自由派的发言人，他们觉得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

在 1960 年代中期，克里斯托尔、贝尔、格拉泽、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创立了

《公共利益》，它持续了 40 年，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称赞“对国内政策产生的更大影响比国家的任何其他刊物都大得多”。

该杂志最初很温和（莫伊尼汉建议称它为共识），支持民权和国内开支。克里斯托尔甚至怀疑越南战争，写到“南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很难成为体面的自我管理。”

但是克里斯托尔和其他人在 1960 年代越来越感到幻灭了，在 1972 年，当民主党挑选反战的自由派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作为总统候选人，他彻底感到厌恶。他支持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大部分知识分子蔑视的，后来被尼克松选为公共广播电视台的董事 Corporation of Public Broadcasting.

他的触觉继续延伸。在 1970 年代中期，他获得了强大的新冠军切尼，当时是福特总统的办公厅主任，是克里斯托尔著作的热情读者。1980 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数不清的新保守主义者成为政府官员和司法领袖。

克里斯托尔在 1995 年写到“所以我认为新保守主义运动是成功的，在带来所需要的因素来使得美国保守主义充满活力帮助重塑美国政治方面是成功的。”

“如果我是快乐的保守主义者，正如有人说我的那样，那是因为我有这么多值得快乐的事。”

克里斯托尔和希默尔法尔布在 1942 年结婚，除了儿子外，他们还有一个女儿，伊丽莎白。

Political writer Irving Kristol dead at 89, By HILLEL ITALIE (AP)

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p/article/ALeqM5i0XoLfHEb_iZ8kA3TzpOaBnCosGAD9AQ5EPO0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